

中国近代史丛书

义和团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00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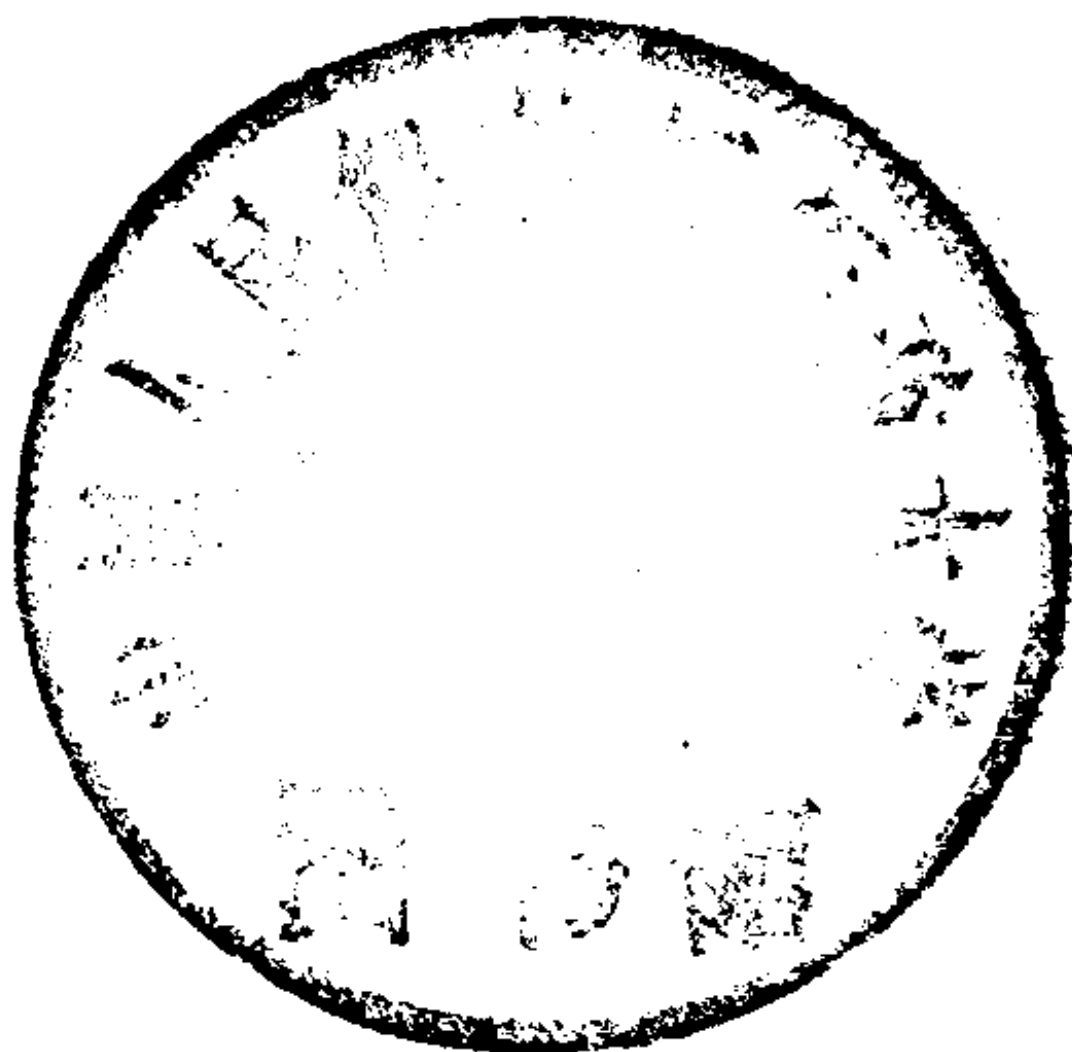


2 037 8648 4

中国近代史丛书

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875 字数 53,000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228 定价: 0.15元

毛主席语录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
二、“义和团，起山东”·····	8
三、席卷京津·····	17
四、全国各地的反帝怒潮·····	25
五、八国联军的进攻·····	34
六、帝国主义策划下的“东南互保”·····	43
七、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	48
八、强盗的暴行·····	61
九、沙俄侵占东北·····	69
十、《辛丑条约》·····	74
十一、义和团的反帝革命精神万岁·····	81

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九〇〇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潮。

十九世纪末年，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而自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开始，亚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争斗，都尖锐地投向了我国，使我国陷入空前的危局。

《马关条约》中规定，日本资本家有在我国各通商口岸自行设厂制造的权利，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侵略要求。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只要一国从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五九页。

^② 同上书，第二四八页。

中国取得了某些侵略特权，其它各国也一律享有。因此，日本在中国取得的设厂权利，也就是帝国主义各国共享的权利。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间，帝国主义便纷纷来中国设厂，如英国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德国的瑞记纱厂，美国的鸿源纱厂等，它们还投资开办面粉、榨油等企业。这些外国资本企业，不仅直接残酷地压榨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也严重地抑制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清朝政府支付日本赔款，大量举借外债。俄、法和英、德两大垄断资本集团，为了通过借款输出资本，取得特权，都向清朝政府揽（音览 lǎn）借，进行剧烈的你争我夺。清朝政府先后三次，分别向这两大垄断资本集团借款，达三万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要以国家的重要收入——关税、厘金作抵，还不得一次或提前还清（这是为了防止清朝政府借债还债，使原债权国失去既得的特权），而英、德借款合同中，还规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要职，须继续由英国人担任。所以这种借款，被称作“政治借款”。

设立银行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这时期除原有的英、德、日等国银行急剧扩大业务外，俄国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也赶忙在中国设立分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还合组了中英银公司。这些银行，掌握清朝政府的借款，控制清朝政府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并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垄断机构。

《马关条约》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日本割占辽东、台湾等大片中国领土。俄国为了保有自己的侵略目标，曾经联络德、法两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这样，便揭开了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领土进行大争夺的序幕，随后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企图瓜分中国。

德国首先出马，一八九六年命令它的驻华公使，“对创造进攻的借口，特别加以注重”。一八九七年八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对阴谋进占中国胶州湾，同沙皇尼古拉二世取得默契。这年十一月，恰巧有两个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即“巨野教案”，德帝国主义分子便兴高采烈地宣称：“现在我们有充分借口，用强硬的话来和中国大人先生们开谈判，并利用这些情况来要求割让土地，以便建立舰队所需的煤栈和港湾”，予以占领。次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胶澳租地合同》，把侵略矛头伸向整个山东。

俄国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是以德国支持俄国夺取旅顺、大连为交换条件的。紧接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当年十二月，俄国舰队突然开进旅顺口，开始对旅大地区的侵占。德国立即表示支持，以此来报答俄国，并说“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华帝国慢慢地、逐步地瓦解”。

法国又以俄国租占旅大为借口，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强占广州湾，并提出了云南、两广不得割让给其它国家的要求，幻想使这个地区和这时已成为它的殖民地的越南联成一片。

日本刚把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侵占为自己的基地，看到

西方各国纷纷在中国大陆抢分地盘，又红了眼。它在英国的支持和德国的默认下，也于一八九八年四月迫使清朝政府答应，不把台湾对面的福建割让或租让给其它国家，将福建作为它夺取的对象。

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最大，当然不甘落后。一八九八年六、七月间，它借口抵制法国势力，在南方强租九龙半岛；又借口抵制俄国势力，在北方强租威海卫。这就不仅认为长江流域是它的独占利益，还把触角伸向了南、北两翼。

因此，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不到三年，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都已划成了帝国主义各自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为了扩大资本输出，巩固并延伸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还疯狂地夺取铁路建筑权，劫掠沿线的土地和资源。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俄国在东北、法国在西南、德国在山东，都取得了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同时，在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当比利时依靠俄、法集团的实力，取得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今京汉线）的修筑权，英国眼看俄、法势力将伸入长江流域，就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承筑铁路的庞大计划，取得津镇铁路（天津至镇江，后为津浦线）的修筑权，与俄、法抗衡。但津镇铁路要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为德国所反对，英国便拉

拢德国，约定天津至山东境内峰（音益 yì）县的一段归德国承筑，峰县至镇江的一段，归英国承筑。

美国在取得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后不久，由于它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和西印度群岛的美西战争爆发，无力兼顾，英国乘机要求调整英、美在远东的关系，加入对粤汉铁路的投资。

英国进而想从山海关截阻俄国势力南下，极力谋取京奉线（北京到奉天，今京沈线）山海关至牛庄铁路的控制权。野心勃勃的俄国，当然不愿英国势力伸入东北，进行抵制，一八九八年英、俄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海关至牛庄铁路受中国政府控制，不得抵押给非中国的公司。这就开了帝国主义互争不下所谓铁路“中立化”的恶例，而英国仍然取得了对这条铁路的借款权。

一八九九年四月，英、俄进一步达成分赃协议：英国不在长江流域以北要求铁路租借权，并不阻止俄国在这一地区取得特权；反过来，俄国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发展侵略势力，也持同样态度。事实上就是策划瓜分。

当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权利而进行紧张的争斗中，美国由于力量不足，又忙于美西战争，没有较多地投入，虽一度想占领大沽口，无奈大沽口是华北主要通商口岸天津的吞吐口，恐为各国所不许，不敢贸然行事。等到美西战争结束，展望中国，另外已没有可以租占的港湾，也没有可供划分的势力范围，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并不就此罢休，而是阴险地寻找新的侵略办法。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国

政府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即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但各国在势力范围内不得限制它国通商、航行等活动。这就是要各国的势力范围都为美国开放，使美国的垄断资本对中国有更多的掠夺机会；另外也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得不可开交的矛盾，保持了它们暂时的侵略“均势”。然而，美国并没有放弃分占中国领土的要求，直到一九〇〇年，它还看中了福州北面的三沙湾，想据为己有，只因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坚决反对，才没有实现。

帝国主义得意忘形，叫嚷中国已经“气息奄奄”，它们准备随时肢解中国，变为它们各自的殖民地。瓜分大祸，迫在眉睫（音洁 jié）。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前的，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抵抗？各阶级都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清朝统治者一贯推行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用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支持，对人民群众则进行血腥的镇压。尽管在统治权力问题上，他们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一些奴才与主子的矛盾，但是指望这样的政府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那完全是梦想。

刚由地主阶级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不满，对民族危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他们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不敢起来革命，他们宁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幻想获得某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采取改良的办法来挽救危亡。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完全是走不通的，所以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变法，只是昙花一现就破产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已开始聚集力量，准备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但是他们的力量还很小，对人民群众又很轻视，根本看不到蕴藏于农民群众中的伟大革命力量。同时，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没有认识，也有某些幻想，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不可能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任务。

那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英勇地抗击万恶的帝国主义。他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巨额的赔款和外债，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特别是早就入侵中国的传教士，深入城乡各地，到处建立教堂，恃强逞凶，对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暴行，更使他们忍无可忍。因此，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洋教斗争，这时普遍地高涨起来。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江苏、山东等省，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一八九八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和四川大足县的农民起义，发出檄（音习 xi）文，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要求一致对外，驱逐外国侵略者。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的迅猛发展，预示着一场反帝斗争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

二、“义和团，起山东”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在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当时人民群众就曾唱出“义和团，起山东”，“保国逞英雄”的民谣，歌颂从山东兴起的这一伟大革命运动。

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一八九五年后，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的狂潮中，山东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对山东半岛发动猖狂的进攻，后来又在交清赔款才能最后撤军的要求下，占领威海卫达三年之久。随后，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把山东两个重要港口置于它们的控制下，而德国更把整个山东划作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胶澳租地合同》为凭借，夺取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一八九八年成立了山东铁路公司和青岛华德矿务公司，强修胶济铁路，掠夺沿线矿产。在修路、开矿时，又大量侵占田地，破坏水道，拆毁房屋等等。英国也在威海卫大逞淫威，自行勘划境界，圈占文登、荣成两县地方，派遣劣绅充当粮总，强迫界内农民纳粮，推行殖民统治。当地人民起来反对这些暴行，又遭到穷凶极恶的

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镇压。大批农民被逐出家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设厂制造，它们的商品更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市场，加速中国农村原有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村破产，手工业者大批失业。这种情况在沿海省区更为严重。而运河沿岸地区，许多城乡人民本来是依靠运河运输和客商来往为生的，自从帝国主义在沿海强行通航以及修筑铁路后，运河的运输量大减，过去客货云集的两岸，这时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大批船户、挑夫、小商小贩丧失生活来源，成为社会的失业群。

清朝政府为了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维持其统治的军费、政费又有增无已，这样，除了向帝国主义借债外，就是加紧勒索人民。一八九六年山东省的田赋银两折收钱数，超过同治年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一倍以上，加上各种苛捐杂税和贪污中饱，农民的负担就更为沉重。如一八九八年发行的所谓“昭信股票”（公债），全国总共募得近两千万两白银，在官绅的重重盘剥下，人民遭受的压榨是极为严重的。以山东的安丘县为例，县官规定：计田亩苛派，按户逼取，不许减少分厘，闹得鸡犬不宁。更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河工废弛，黄河连年溃决，造成北方的严重灾荒。山东仅在一八九八年一年中，大部分地区被水淹没，又有五十个州县受旱灾，灾荒吞噬（音世 shì）了无数生命财产，千百万农民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

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教士，配合各个帝国主义的

侵略部署,更是无孔不入,同瘟疫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如英国的李提摩太、美国的李佳白、法国的樊国樑、德国的安治泰等,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罪恶昭彰的侵略分子,长期窜居中国,既是各个帝国主义的重要代理人,又是清朝政府的座上客,起着比帝国主义公使还要广泛和深入的侵略作用。他们搜集情报,制造侵略借口,挟制签订不平等条约,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这时更加猖獗起来。如安治泰这个家伙是德国在山东的主教,直接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宠信和支持,又被清朝政府赏以二品顶戴的头衔,气焰嚣张,驾于总督、巡抚之上。当“巨野教案”发生时,他赶回德国,亲自进见威廉二世说:“这是德意志帝国在亚洲取得地位、恢复威信不再来的时机了!”怂恿出兵占领胶州湾。

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从通都大邑到边远的乡村,撒下了一副教堂网,这些教堂就成为一个个侵略据点。据统计,到十九世纪末年,仅山东一省就有教堂一千多所,传教士和教徒八万多人。这些传教士,在他们的主教、大主教指挥下,盗窃各种情报资料,霸占田产,逞凶杀人,包揽词讼,敲榨勒索,收买流氓歹徒入教,制造种种事故,欺压中国人民。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对于所谓“民教纠纷”,总是“护教抑民”,以致“民冤不伸”。层出不穷的“教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而每经一次“教案”,帝国主义就要求惩办一次“案犯”(杀害反抗压迫的中国人),勒索一次赔款,扩展一次教堂。这样,中国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舍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因此，十九世纪末年，中国人民越来越频繁的反洋教斗争，在山东大为发展。一八九六年，曹县和单县一带的大刀会掀起了反洋教斗争；一八九七年，巨野、寿张、济宁、荷（音河 hé）泽、成武等州县掀起了反洋教斗争；一八九九年，沂州、平原、肥城等地也激烈地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义和团的熊熊烈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山东燃烧起来的。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带有比较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组织，它的成员以练习拳棒著称，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在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一带从事反清活动。虽然清朝政府对它进行了多次血腥镇压，但它的反抗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随着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义和拳的活动也日趋活跃，斗争矛头更日益强烈地指向“犹如虎狼恶”的帝国主义，并由秘密转为公开。义和拳也改称为义和团。

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一般是“坛”，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还有不少妇女，青年妇女参加“红灯照”，中年妇女参加“蓝灯照”。红灯照以手提红灯为标志，是妇女中的尖兵，参加战斗，惟恐落后。义和团各起的首领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等称号，一般下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哨队等名目。不论是首领还是普通拳民，都要遵守纪律，紧密团结，服从命令。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水陆运输工人、小商贩等。作战时十人为一班，为首的叫十长；十班为一个大队，为首的叫百长。打仗时都有旗帜，十人是三角小旗，百人是方形大旗，中间写一个“令”字，全军大

旗是锯齿形，上写“义和团”几个大字。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后，清朝政府连忙下令镇压，妄图扑灭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焰，但是毫无效果。清朝政府恼羞成怒，一八九九年三月撤了山东巡抚张汝梅的职，改派著名屠夫毓（音育 yù）贤为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以前做曹州知府时，一年之中就杀死大刀会等群众两千多人。因为杀人有“功”，连升了几级，清朝政府这次任命他做山东巡抚，就是要他大肆屠杀山东义和团。“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① 毓贤到任后，立即执行清朝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然而义和团不仅没有被杀光，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星星之火终于变成燎原之势。

一八九九年，山东平原县发生灾荒，老百姓饥寒交迫，可是地主奸商却伙同传教士，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引起广大群众极大愤慨，使原来已经十分尖锐的民教矛盾更加激化。这年九月，平原岗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无故欺凌贫民李长水，当地群众愤愤不平，与李金榜斗争。李金榜依仗教会势力，竟以“抢案”报官，横加陷害，义和团群众六人被捕入狱。当地群众为了营救受难的伙伴，到茌（音池 chí）平请朱红灯前来援助。

朱红灯是山东泗水人，一八九八年因避水灾到长清县，以

^①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讲话》，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六页。

行医为业，后来参加了义和拳，习拳练武。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贪官污吏斗争勇敢、坚决，得到群众的拥护，成为当地义和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他从长清率领队伍向往平、高唐、平原一带发展，与当地义和团领袖本明和尚、王立言等联合，义和团队伍迅速扩大起来。

朱红灯得到求援的信息，就在十月九日率领团众来到岗子李庄。十一月，县官蒋楷率领清军一百多人前来捉拿朱红灯。义和团奋勇迎战，把清军打得狼狈逃去。接着，毓贤又派兵到平原攻打义和团，在森罗殿又被义和团打得大败。

毓贤这个心狠手辣的老狐狸，看到武力镇压无济于事，就使出另一反革命手法，假装承认义和团，企图用欺骗的办法控制义和团。

当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特别对于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朱红灯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但这并没有影响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方向，他们在把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的时候，仍然严厉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他们杀了一些媚外的大官僚，没收了这些大官僚的财产，并且制定了攻打北京的计划。随着，他们又提出“灭洋人，杀赃官”的斗争口号，高唱“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兽官；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充分表明义和团的铁拳在狠揍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必然要打击到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

森罗殿战役结束后，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回到往平、高唐，

更积极地从事发展工作，以壮大自己的队伍。但由于对清朝政府缺乏应有的警惕，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不幸于十一月底被毓贤骗去杀害了。

朱红灯、本明和尚虽然被害，广大义和团群众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们在另一个首领王立言的率领下，继续坚持斗争，英勇转战于茌平、恩县、平原一带。

在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间，山东境内，除朱红灯率领的这支规模较大的义和团队伍外，其它许多州县的人民，也都在义和团的旗帜下开展了斗争。平度州义和团捣毁了浸礼会教堂，一度占领了平度城。曹州地区的义和团，焚毁了德国教士敲榨勒索修建起来的曹州府城大教堂，并拆毁了境内其它教堂。单县义和团在反洋教斗争中，打死了前来镇压人民起义的清军参将。莒（音举 jǔ）州一带的义和团，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莒州城东团众在捣毁教堂时，地方官吏前往镇压，刚出城就被包围起来。在团众的包围下，反动官吏丑态百出，哀求活命，当众发誓以后不再干涉群众的反洋教斗争。自此，义和团在莒州地区大大活跃起来，他们捣毁教堂，驱逐教士，使帝国主义分子没有藏身之所。

位于山东东部的烟台，面临渤海、黄海之间，早已开为商埠，是帝国主义在山东的重要侵略基地。义和团兴起后，各地的传教士成批地逃奔到这里来，义和团跟踪追迹，对烟台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使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义和团在山东各地展开斗争，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一

致的号令，但是行动就是号令，他们闻风而动，一呼百应，反对洋教，打击帝国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反帝声势。

在蓬勃发展的义和团反帝怒潮面前，帝国主义者十分惊慌。各国驻北京公使不断催促清朝政府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一八九九年底，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叫嚷，住在山东的美国人受到了义和团的“威胁”，公然要清朝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毓贤，说毓贤不能控制义和团、保护传教士，应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在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来协助。这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把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调来接替毓贤的职务。可见帝国主义早就看中了袁世凯这条走狗。清朝政府立即遵命撤换毓贤，升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要他出马绞杀义和团运动。

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袁世凯带领他的“新建陆军”来到山东。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报答帝国主义对他的赏识，第二天他就出了一个《禁止义和拳告示》，对义和团大肆恐吓说，他“统率重兵，弹压镇抚，……（义和团）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碎。”更杀气腾腾地向喽罗发布命令说：“如‘匪’至即开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他一面张贴反动布告，一面派遣军队对义和团进行围剿。

袁世凯的疯狂镇压，并没有吓倒义和团。就在袁世凯率军屠杀的日子里，济南人民包围了洪家楼教堂，拆毁了象征侵略势力的十字架，砸碎了传教士的墓碑，把这些侵略分子的坟地也铲平了。肥城人民杀死了作恶多端的英国传教士伯鲁

克，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处。平阴、长清等处人民，也纷纷参加对当地教堂的攻击。义和团在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扫荡中，同袁世凯派来围剿的军队，也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战斗，经常主动出击，使袁世凯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不得不哀叹“办理棘手”。

袁世凯看到他的反革命军队无济于事，就在山东大加扩充，又招募和调编军队二十营，连同原有的“新建陆军”七千人，将近两万人，成为一支庞大的反革命武装。他并和青岛的德国侵略军和教堂的反动武装勾结起来，残酷地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山东义和团势力受到很大的摧残。

袁世凯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山东人民的无比愤怒，当时民间流传“杀了袁鼃(音元 yuán)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表达了对他的切齿痛恨。并有人在巡抚衙门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一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伏在洋人屁股后面。袁世凯看到革命人民的这种愤怒情绪，十分惶恐，特地在卧室周围装上层层铁丝网。

义和团除留下一部分人在山东继续战斗外，主要力量于一九〇〇年春由山东向直隶转移，与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把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推向高潮。

三、席卷京津

直隶是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心，义和团一类民间秘密组织，早就在这里开展反清活动，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山东义和团掀起“灭洋”旗帜后，一八九九年直隶南部、邻近山东的故城、景州、东光、阜城一带的农民，已设立“拳厂”，练拳习武，发动反洋教斗争。天津和北京两个大城市，也开始骚动起来。

一九〇〇年春，由山东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在景州、故城一带，与当地义和团取得联系后，整顿队伍，分成两路继续前进。一路沿着运河北上，目的地是天津；另一路则指向芦汉铁路，进军北京。但是向天津进发的义和团，遭到吴桥知县劳乃宣和驻扎在沧州的贵州提督梅东益的阻击，实力蒙受很大损失，所以后来义和团在京、津地区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得不由后一路担负主要责任。

从景州指向芦汉铁路、进军北京的义和团，虽然一路上也遭到清军和教堂反动武装的围攻和堵截，但义和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了敌人的围攻和堵截，推进到白洋淀。他们在这里分出一支队伍，开辟雄县、文安、霸州等地，大队人马仍然继

续北上,以定兴为中心,向四面扩展,把新城、涿(音桌 zhuō)州、涞(音来 lái)水、高碑店等地,变为他们的战斗基地。在当地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义和团严厉制裁外国教会反动势力,痛击清军,纵横驰骋(音逞 chěng),英勇地开展武装斗争。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使得中、外反动势力更加惊慌。帝国主义不断警告清朝政府,要它赶快将直隶境内的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就要自行调兵镇压。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副将杨福同带领军队前往涞水镇压。杨福同一到,立即疯狂地屠杀当地人民。清军的暴行,激起了义和团群众的满腔怒火,他们探知杨福同将于二十二日去定兴攻打义和团,就在中途石亭地方的沟道里埋伏了二、三千人,准备一举歼灭来犯的敌人。

二十二日清晨,杨福同骑着马,带领一队清军,向石亭地方走来。义和团等杨福同进入埋伏圈,立刻蜂拥而上,把清军团团围住。石亭地方沟道纵横,马队根本无法施展,杨福同连呼马队开枪射击,但义和团已冲进马队,杀得清军人仰马翻。杨福同看形势不妙,连忙打马突围,义和团哪里肯放,手起一刀,砍中杨福同的战马,杨福同摔下马来。清军还想来救,义和团刀矛并举,早就结束了他的性命。二十七日,义和团主力万余人,乘势攻克北京南面的战略要地涿州。这时活动于涿州附近的义和团群众,已达数万人,革命势力在直隶境内迅速壮大。

义和团在石亭一战的胜利,使得清朝统治者丧魂落魄。裕禄连忙调他们的“王牌”部队——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

军”，前往镇压。义和团为了粉碎聂士成的攻势，破坏了芦保线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以北到琉璃河的铁路；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地的车站；又袭击京津铁路的丰台车站，把地主阶级的总头目西太后、光绪帝专用的“龙车”，也付之一炬。由于铁路被拆毁，清朝军队南、北两路的增援路线被截断，义和团又于六月初分头发动进攻，把聂士成的军队压回天津。

在这前后，义和团的队伍陆续进入北京。

北京城里，在当年春天就有了义和团的踪迹。不过人数少，也没有公开活动，只是在“灭洋”的要求下，用匿名揭帖的方式，制造气氛。从四月下旬起，西南郊的黄村镇、庞各庄一带，日益成为义和团群众集结的场所，他们就近渗入市区，北京的劳动群众也行动起来，相率加入义和团，城里的交通要道，特别是教堂周围，大量出现揭帖，有张揭帖写道：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他们还把预先埋在温泉山的石碑挖掘出来，以鼓舞群众，石碑上刻着这样的词句：

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成群。……红灯照下，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待当重九日（重阳节），剪草自除根！

义和团通过揭帖这种民间习用的宣传形式，揭露清朝政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卖国求荣、欺压人民的滔天罪行，发动群众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有的揭帖还针对侮

蔑义和团的天津《国闻报》发出警告：

《国闻报》上多谬妄，胡言乱语任意登，该报因有日（本）人保，故敢造谤诋（音抵 dī）我们。兹特示汝《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

《国闻报》原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办的报纸，戊戌政变时被封闭，后由日本人出面复刊，成了帝国主义的喉舌。义和团的揭帖，给了它当头一棒。

到处是揭帖，到处是“灭洋”的旗帜。六月上旬，北京附近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个人一队，不分昼夜，一日几十起地进入北京。那时清军的广大士兵，受到义和团反帝爱国宣传的影响，义和团出入城门，守城士兵不但不加阻拦，还肃立致敬，有的还替义和团喝道开路。义和团战士头裹红布，腰扎红带，穿着镶有红边的鞋袜，手持大刀长矛，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行。到了六月中旬，更有大队义和团，从各县浩浩荡荡开入北京。在这种声势的鼓舞下，北京城厢内外的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成千上万地投入义和团，城内设“坛”达八百多所。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练拳，每天下午，景山后面的宫墙下，都有青少年操练；南下洼一带，也有义和团在教练青少年打拳；前门外打磨厂等处，又是另一种景象，那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赶制刀枪。这些都表明，义和团正在加紧武装自己，为迎接更大的战斗作准备。

这时，整个北京已处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皇宫、衙门、王公贵族的住宅，都有义和团入驻；路口、城门都有义和团日夜盘查可疑的行人。外国侵略者成了众矢之的，他们麇（音群 qún）

集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有的甚至躲在棺材里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被义和团查获。义和团经常在夜里示威游行，高呼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义和团对专门贩卖“洋货”的商店提出警告，把前门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烧掉，表示严禁“洋货”的决心。许多商店连忙改换“洋”字招牌，“洋药店”改为“土药店”，“洋货店”改为“广货店”，唯恐遭到惩罚。义和团还动员居民不买“洋货”，把“洋油”（煤油）倒在街上，把“洋油灯”扔掉。这一切表现了义和团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和极大蔑视，也反映了北京城内人民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

当义和团拥入北京时，天津也在义和团的里应外合下，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斗争。

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比较早，是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成了他们侵略华北的基地。他们在这里设置码头、洋行、银行、工厂和教堂，领事、商人、传教士等披着各种外衣的帝国主义冒险分子聚集在这里，横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怒。当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天津人民也开始了组织义和团的活动，散发揭帖，传播民谣，号召人民群众投身到反帝斗争的行列中来。

天津的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都积极投入义和团，在各处设“坛”练武，准备和帝国主义展开一场大搏斗。一九〇〇年四月底，义和团发出勒令外国侵略者一律滚蛋的揭帖：告诉你们各耶稣教堂知道，现在限令你们在一个礼拜内，教堂中

的人全部离开教堂，如果违抗命令，就将各教堂的房屋全部拆毁，放火烧掉，到那时你们将悔之莫及了。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命令，理直气壮，斩钉截铁，不容外国侵略者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打击了这批害人虫的嚣张气焰，灭了他们的威风。

五月间，义和团又在天津贴出这样的揭帖：

兵法易，助学拳，要擒（音疾 bìn）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他们在这里提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办**法**：挖掉铁路，砍断电线，毁坏轮船等等，不准它们再吸中国人民的血汗，把外国侵略者统统赶出中国，打得它们“心胆寒”、“势萧然”，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气概。

这些活动也同北京一样，为大队义和团进入天津准备了条件。但是，大队义和团进入天津，不象进入北京那样顺利。原来计划从景州沿运河北上的义和团，在吴桥和沧州两度遭到清军的屠杀，实力大为削弱。而从京津铁路沿线开往天津的义和团，也在中途遭到聂士成部队的截杀，未能前进。六月间，义和团重新组织力量，才由文安、霸州等地进入天津，因而时间比进入北京略晚。

大队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同原在天津活动的义和团汇合起来，声势大振，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也更加踊跃。天津顿时出现了波涛翻滚的反帝怒潮。

在那沸腾起来的日子里，天津的义和团群众经常手持刀枪，高呼反帝口号，走过大街小巷，游行示威。他们在帝国主

义及其走狗面前，挺起腰杆，威武雄壮，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不仅使外国侵略者心惊肉跳，也使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吏威风扫地。义和团群众在街上行走，如遇到清朝官僚，坐轿的就喝令下轿，骑马的就喝令下马，脱帽傍立，这些封建官僚只得乖乖地照办。昔日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气势，被打得精光。义和团对于镇压他们的清军头目，表示极大的仇恨。他们说：如灭洋人，必须将聂士成、杨福同这种人一并杀死。杨福同已在涞水战役中被击毙，对聂士成决不放过。

一天，聂士成骑马经过河东兴隆街，正好迎面有义和团百余人列队走来，义和团一见聂士成，怒从心头起，立刻举刀追赶。聂士成大惊失色，慌忙跳下马鞍，绕路逃走。天津人民目睹堂堂的“聂军门”（提督），在义和团面前抱头鼠窜的样子，真是大快人心，纷纷奔走相告。

义和团在天津打造刀枪，武装队伍，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开展斗争。他们焚毁教堂，砍断电线杆，砸烂海关道署衙门，把市、郊广大劳动群众都吸引到斗争的行列中来，同北京义和团的斗争互相呼应，造成了震撼中外反动派的巨大声势。

义和团的发展，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仅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就席卷整个京、津地区，表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投入斗争的无穷威力。他们的行动，无疑都是革命的。然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污蔑为“匪党作乱”，这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打击农民反帝斗争的论调，是反革命的论调。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这些革命行动，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

——义和团，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他们的行动好得很！由于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①，还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教堂、铁路、电线、轮船、洋货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莫大损害：“洋人洋人，害死咱们，修了铁路，运走财宝。”因此，他们起来反抗时，就把满腔的仇恨，倾泻到教堂、铁路、电线、轮船、“洋货”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九〇〇年的夏天，北京和天津完全成了义和团的天下，到处是革命烈火在燃烧，到处是斗争风暴在呼啸。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五页。

四、全国各地的反帝怒潮

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特别是进入北京、天津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邻近山东、直隶的东北、山西、内蒙古和河南等省区，义和团更是很快组织和发动起来，他们和京、津的义和团一样，集中目标，狠狠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首先侵入东北，夺取了在东北修筑铁路和铁路沿线的行政、采矿以及贸易减免税厘等特权，又强占了旅顺、大连。沙俄的侵略行径，遭到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一八九八年铁岭、辽阳、长春等地都发生过反对沙俄占地筑路的斗争，黑龙江也发生过反对沙俄夺取金矿、森林等资源的斗争。当山东、直隶义和团战斗的消息传到东北，东北人民的反帝怒火立即燃烧开来。

一九〇〇年二月，营口附近开始有义和团公开练拳。三月间，锦州一带也有人练拳练刀，不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拳坛”。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盛京（沈阳），义和团也盛行起来。城内到处贴满了痛斥帝国主义的揭帖，据当时的记载说，这些揭帖揭露了外国人侵犯中国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输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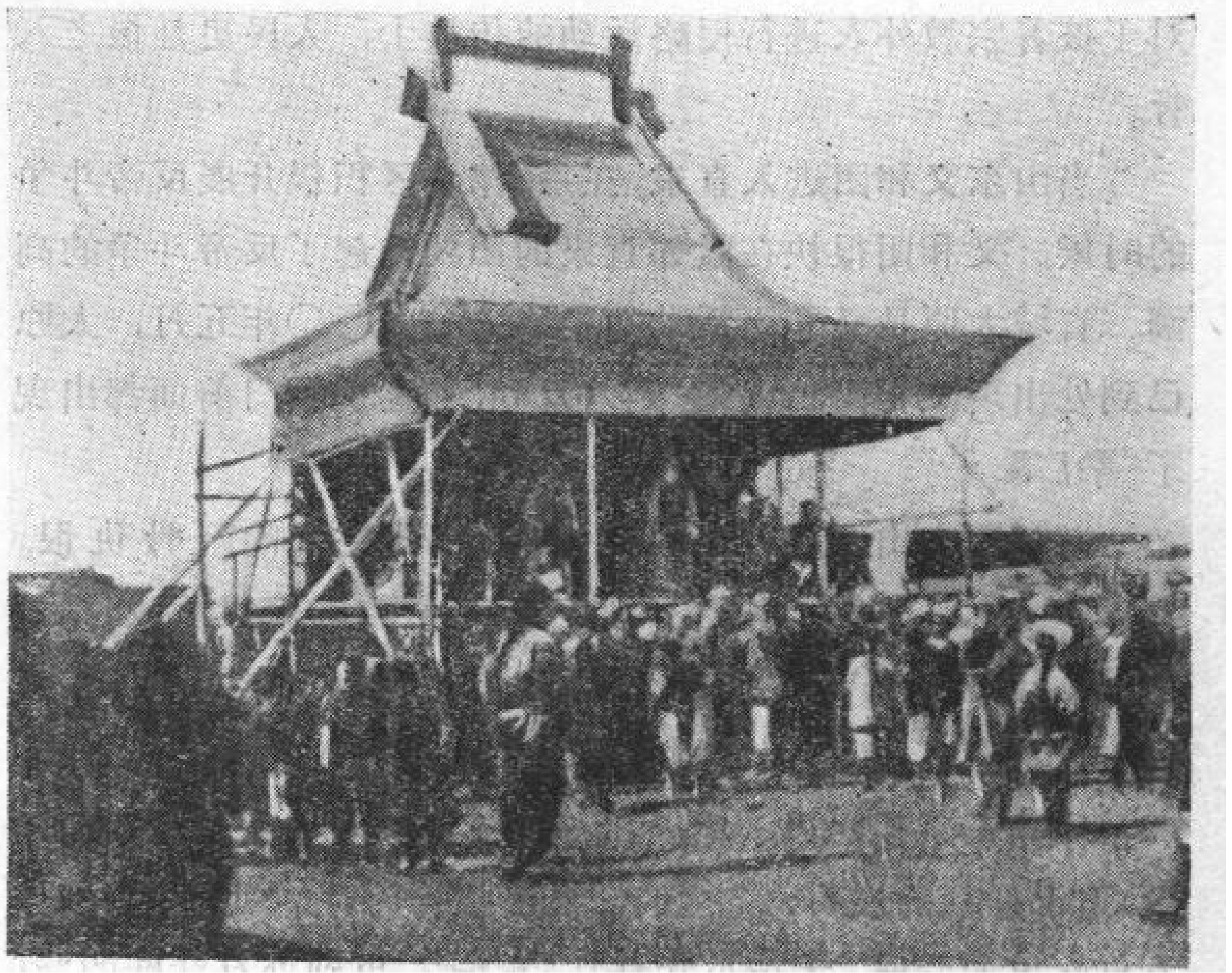
鸦片到占领海港,甚至还举出向井中放毒、戕(音腔 qiāng)害幼儿等事件;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而清朝政府镇守辽宁的盛京将军增祺(音其 qí),竟下令“查拿”义和团,企图扼杀群众的反帝斗争。但是,州县官对义和团“惮于威势,不敢驱逐”,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浪潮,在白山黑水间日益澎湃。

六月二十六日,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铁路的桥梁。三十日,义和团在盛京城内对侵略者发动大规模的斗争,烧毁内治门外和东南小河沿地方的英国教堂。七月一日,城内的外国教堂以及俄国铁路公司均被义和团捣毁,只剩下德盛门外的法国教堂(天主教盛京总堂)。这个教堂的主教法国人纪隆,妄图凭借教堂建筑高大、墙壁坚固,进行顽抗,更激起了义和团极大的愤怒。义和团下定决心:“非尽毁其洋楼不止。”二日,这个侵略堡垒终于被攻下,帝国主义分子纪隆也被击毙。

到七月底,整个辽宁境内,北起开原,南至海城,五百里以内,除鞍山站外所有沙俄铁路桥梁都被义和团拆毁;除新民三台子教堂和朝阳松树嘴子教堂外,其它各府厅州县的英、法、美等国教堂都被焚毁。

在吉林和黑龙江境内,义和团也对侵略者发动了猛攻。七月中旬,长春义和团焚毁了城内天主教堂、城外耶稣教堂和二道沟沙俄火车站。瑗瑛(音爱灰 àihuī)的成千筑路工人,攻打沙俄监工,沙俄铁路的员司纷纷逃窜。

义和团在东北对侵略者发动攻击后,几乎全部烧掉了帝



义和团在东北利用戏台进行宣传

国主义的教堂，拆毁了帝国主义修筑的铁路、桥梁、车站和公司楼房，破坏了帝国主义控制的矿山。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传教士，有的遭到义和团制裁，有的狼狈逃窜到大连、哈尔滨等地躲避。

山西也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山西虽然地处祖国腹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早就伸向这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德等国就派遣间谍分子到山西窃取煤、铁资源的情报。一八九八年，英、德、俄又攫取在山西修筑铁路、开矿的权利。帝国主义的这些侵略行为，激起了山西人民的反抗。

对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传教士，人民更是恨之入骨。

当山东义和团进入直隶，在京、津地区积极开展反帝斗争的时候，义和团很快在紧邻直隶的山西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省城太原是义和团活动的中心。一九〇〇年五月，太原已到处出现义和团的揭帖，到六月间，连巡抚衙门前面都出现了“拳厂”。

义和团在山西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六月二十七日，当义和团在太原东夹巷教堂前聚集示威时，教堂里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愤怒的群众立即将教堂焚毁。七月十日，义和团又烧毁了大北门天主教堂。十一日，榆次县什贴镇义和团进入太原，巡抚毓贤（当年由山东调任山西）迫于群众的威势，将他们迎入巡抚衙门，太原义和团的势力自此更加发展，大街小巷都是“拳坛”，也到处有活跃的“红灯照”。太原同北京、天津一样，成了义和团的天下。这年七月，义和团已遍布全省各个州县，有的县甚至村村都有义和团的力量。

内蒙古地区的反帝斗争烈火，也燃遍了整个草原。

内蒙古这个祖国的塞北地区，那时候交通还很不方便，但是外国侵略势力也没有放过这个地方。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就在西湾子设立了蒙古教区的总教堂，八十年代更扩充为三个教区；同时，基督教也跟踪而来，在归化（呼和浩特）等地活动。他们的侵略行径，曾经遭到蒙、汉人民的坚决抵制。

因此，一九〇〇年春，当义和团势力还没有发展到内蒙古

西部的时候，内蒙古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二厅和准噶尔旗的蒙、汉人民，就开展了反洋教斗争。六月间，当义和团势力由直隶向山西境内发展时，在内蒙古西部，东起集宁、丰镇，西至托克托，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当时在内蒙古的一个传教士，胆战心惊地写信给教会会长说，托克托的义和团两千余人于六月十八日来攻西营子教堂，后来愈聚愈多，“集于东西两庙中，人山人海，一望如云”，然后鱼贯而出，向教堂进发。可见义和团的革命风暴，正在强烈地袭击着塞北的外国侵略势力。到七月间，运动更向整个内蒙古地区扩展，东至察哈尔西四旗、兴和一带，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一带，北至乌盟四子王旗，南至伊盟鄂托克旗、乌审旗的最南端城川，凡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的地方，都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反帝斗争。

其中围攻萨拉齐二十四顷地、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和鄂托克旗城川等地天主教堂的战斗，最为激烈。这些教堂都筑有高厚的土堡围墙，拥有精锐的武器。他们负隅顽抗，以为可以躲开中国人民的惩罚，但在义和团的勇猛攻击下，都一一失败了。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老“中国通”韩默理，也被义和团捉住。群众把这个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带到托克托进行公审，背上插一面小旗，写上“老洋魔”三个字，推出游街示众，人民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在山东、直隶掀起反帝高潮的时候，大量反帝揭帖由山东、直隶传入河南。那时河南很多地区大旱，“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的话，给黄河两岸的群众发出了反帝的动员信号。

河南的义和团迅速行动起来，会同那里的大刀会、江湖会、仁义会等群众组织，把河南的反帝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南阳靳（音近 jìn）岗和确山韩庄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南阳靳岗教堂，是天主教在河南设立的总教堂。主教安西满是南阳地区的“太上皇”，操纵官厅，包庇坏人，无恶不作。这个教堂四周用混凝土筑起围墙，高达三丈，有炮楼、枪垛，俨然象个城堡。人民群众恨透了这批横行霸道的吸血鬼，早就想捣毁这个帝国主义的巢穴。

一九〇〇年七月初，南阳的义和团群众，扛着木锨、铁耙、刀矛、棍棒，潮水般地涌向靳岗教堂，他们沿途高喊“扒洋楼，报冤仇”的口号。广大群众同仇敌忾，争先恐后地参加到战斗队伍中来，很快聚集了七千多人，把靳岗教堂围得水泄不通，几天后更扩大至数万人。与围攻靳岗教堂同时，又有许多义和团群众拥入县城，同城内人民一起，拆毁了城内的天主教堂，商人并举行罢市支持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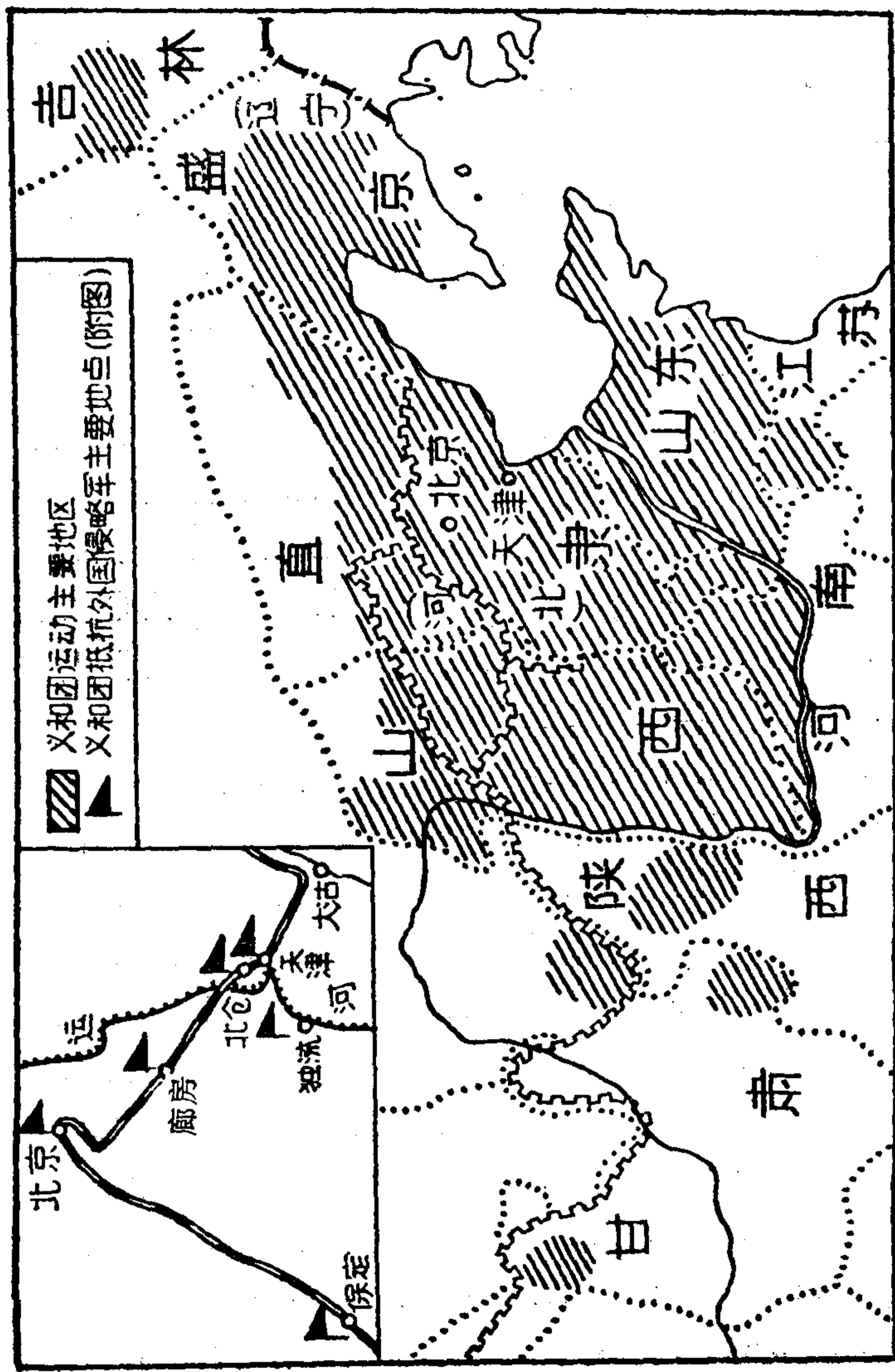
九月间，确山县义和团对韩庄教堂发动了猛攻。十八日，韩庄周围数十里的村镇，全部动员起来，从十六、七岁的青年到五、六十岁的老人，无不奋勇当先，投入战斗。老弱妇孺从十几里以外赶来送水、送饭，络绎不绝。义和团勇敢奋战，扫平了这个黑窝。

除了南阳、确山两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外，还有周口人民拆毁了英、美帝国主义的耶稣教堂，将外国侵略分子驱逐出境；林县的义和团率领群众在攻打教堂时，打开教堂仓库，把粮食分给广大人民；其它如襄城、方城、汤阴等数十州县，也都

发动了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反帝斗争。一九〇〇年一年之内，河南“全境教堂毁四分之三”，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严厉的惩处。

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开始，借揭帖的传布和成员的奔走串联，在几个月中，将战旗插遍了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千百万群众汇合成前所未有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强大风暴，完全打乱了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相勾结，在长江流域策划了所谓“东南互保”（下面有专节叙述），凶横地破坏了义和团的向南发展，但是他们并不能阻止义和团的强烈影响，更不能制止中国人民一定要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的普遍要求。因此，就在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从长江下游到边远的西南、西北以及两广，仍然接二连三地掀起波涛翻腾的群众反帝斗争。

这些省区的斗争，是与华北地区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七、八月间，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福建、广西、陕西、甘肃等省不少地方，出现了义和团的反帝揭帖。据记载，曾有义和团群众数人，深入到甘肃的凉州地方，遍贴揭帖；厦门出现的揭帖，更指出义和团“由北迄南，所向无敌”；湖北汉阳的操场上，有人公开练习拳术；广西贵县也发现团众在那里教练拳术。所有这些省区，群众都普遍展开了焚毁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仅江西一省就焚毁或拆毁了教堂三十九处；湖南在焚毁衡阳总教堂时，对帝国主义的教会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云南在焚毁昆明、师宗、陆良等地教堂时，同法国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类斗争遍及各省，有的甚至遍及各州



义和团武装斗争的主要地区

县,达到几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高峰。

这些省区的会党,也纷纷起义,如浙江的白旗党、斋教,攻破江山、常山、开化等县城,红教会二、三千人在洞庭湖北岸发动了起义,陕西渭南的哥老会打着“毁教灭洋”的反侵略旗帜发动了起义,四川新繁的红教也发动起义。云南个旧的矿工,更聚众至数万人,快枪数千杆,准备驱逐法国的侵略势力。他们都把矛头集中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这就是一九〇〇年从北到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帝怒潮的宏伟场面。

五、八国联军的进攻

义和团运动的烈火烧遍北方,波及全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纠合在一起,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既争夺又勾结的。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革命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革命,可以暂时从无穷的纠纷中摆脱出来,携手合作。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八国联军”,就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拼凑起来的。

首先,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看来,如果不及时地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那么,各国在中国所掠夺到的既得利益,以及今后的进一步扩张,都将化作泡影。

其次,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担心,义和团运动如果取得胜利,势必将在它们的殖民地发生巨大的反响,引起殖民统治的动摇。一个美国政客在给国务卿的信中,忧心忡忡(音充 chōng)地说:“中国的暴动可能影响波斯和中亚细亚,并引起阿拉伯民族的总暴动”,殖民统治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

再次，帝国主义各国企图发动一次新的战争，进一步控制它们的走狗——清朝政府，以便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

帝国主义的联合行动，在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就开始了。美帝国主义叫嚷：“对待华人，应该表示列强一致。”为了统一步调，他们专门就镇压义和团的事，进行频繁的接触。一九〇〇年四月六日，美、英、德、法四国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联名向清朝政府总理衙门发出照会，声称：“限两个月将义和团剿除净尽，否则四国发水陆各军入直(隶)、(山)东两省，自行平乱。”以战争威胁清朝政府。但是，义和团不但没有被“剿除”，反而以侵略者预料不到的速度，发展得更加强大了。帝国主义眼看清朝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五月二十八日各国公使纷纷请求本国政府直接出兵镇压。三十日，帝国主义的兵舰云集大沽口，挑起了新的侵略战争，阴谋乘机瓜分中国。

美帝国主义在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因为在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它没能抢到更多的东西，正在寻找机会伸出魔掌来。美国总统麦金莱曾问国务卿海约翰说：“假如有一天中国被瓜分，我们也可以取得一块吗？”紧接着，美国在中国的一些间谍、特务也都叫嚷起来，传教士李佳白宣称，美国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时，他说：如果瓜分即将着手，“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应取得平等的一分”。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传教士、侵华老手丁韪(音伟 wěi)良，更加猖狂地说：“我们把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把势力伸展到日本和中国，是一种自然的生长。……现在，一个好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一机会。”

英帝国主义也不例外。当时一个英国传教士公开向英国政府出谋献策，要英帝国主义袭用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犯大沽口的故技，再干一次血腥的罪恶勾当。

就在这种阴谋策划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先致电英国政府，要求英国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这两个侵华老搭档，一拍即合。但英国正忙于南非的殖民战争，不能抽调大量兵力，便极力怂恿日本，建议由日本担任镇压义和团的主攻力量；同时想利用日军在北京组成一个反俄堡垒。

日本早想出兵，以便乘机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本外务大臣青木，曾向英国驻日公使示意：日本如果得到英国的赞同，愿多派军队去中国。青木又召见各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政府甚欲与关系各国，决定一致之行动”。现在看到英国拉拢它，更是求之不得。

沙俄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当然和其它帝国主义完全一致，但它害怕日本在这一争夺中占了上风，不利于自己对中 国推行的侵略计划，连忙表示：“对于如此大事件，而委任全权于一国，为人所不喜。”最后，经过一番交易，帝国主义一致议定，各国都派遣自己的军队到中国。近代史上最卑鄙、最野蛮的一次联合侵略战争，就是在英、美帝国主义这样策划下进行的。

五月三十日，英、美、俄、法四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威胁说：“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就是说，

清朝政府必须彻底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于是帝国主义调兵遣将，一面以保护使馆为名，由天津派兵去北京；一面在大沽口外集结大批兵舰，决定大举进攻。五月三十一日，英、美、俄、法、日、德、意等国侵略军数百人，居然在清朝政府的同意下，由天津乘专车开抵北京。六月二日，帝国主义兵舰二十多艘驶泊大沽口外，到六日，仅俄、法两国兵舰就增至十七艘，并有侵略军六百人在大沽口登陆。十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各国侵略军两千多人，又自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这支侵略军被义和团迎头痛击，狼狈地逃回天津。

帝国主义侵略军为了夺取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的滩头阵地，六月十六日向大沽守将罗荣光提出通牒，声称不占领炮台，他们代平“匪乱”不方便，限定守军于第二天清晨二时前撤退，交出炮台，否则即以武力夺取。罗荣光和全体官兵拒绝撤退。十七日晨，帝国主义的兵舰便一齐向炮台轰击。守军被迫还击，经过五个多小时激战，击沉、击伤敌舰六艘，侵略军死伤两百多名。由于岸上炮台的弹药库被侵略军击中，爆炸起火，炮台陷入敌手。自此八国联军从大沽口源源登陆，进犯天津、北京，对中国人民采取了空前规模的掠夺和屠杀。

义和团为了把帝国主义势力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为了保住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这时候展开了紧张的活动。

清朝封建统治者从来就是仇视人民的，在一九〇〇年五

月底以前，清朝政府对义和团一直是下令镇压。无奈力不从心，清军连吃败仗，涞水一战，几乎全军覆没，连带兵头目也送掉了性命。紧接着义和团在直隶境内胜利发展，直趋京、津，清朝统治者更焦虑地喊道：义和团“蔓延已将千里之遥，入其教者当不下千万之众，消息灵通，一呼百应，志不在小可知”。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惶惶不安。

六月初，帝国主义在大沽口的不断增兵和在京、津间的军事策划，引起了清朝政府内部很大猜疑。原来在戊戌政变后，清朝中央政权完全由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掌握，光绪帝被软禁在宫中。顽固派曾扬言“皇帝病危”，想偷偷地把他害死，不料英、法等国驻北京公使竟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西太后又准备立端王载漪（音衣 yī）的儿子为大阿哥（太子），逼迫光绪帝行让位礼，各国公使拒绝入宫祝贺，表示不予承认。西太后的废立计划，就这样一直未能如愿。因为戊戌变法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曾想拉拢光绪帝和改良派，以对抗支持西太后的沙俄。这时帝国主义的大军压境，顽固派害怕它们有暗助光绪帝的意图，很不自安。因此，西太后周围的一些亲信如载漪、徐桐、刚毅、李莲英等，都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这种可能的意图，以稳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西太后同帝国主义既有这种若明若暗的争斗，她又从周围的臣仆中听到有关义和团神威的种种传说，就想变换一下手法，对义和团进行欺骗、笼络。六月六日，她派亲信大臣刚毅、赵舒翹（音窍 qiào）等，去涿州、保定等地侦探义和团的实

力,以便决定对策。

六月八日夜,义和团在北京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参加了这一行列,口号声响彻北京全城。这种声势的发展,使清朝政府的统治秩序将有完全瓦解的危险,清朝统治者更加恐惧。九日,西太后密令董福祥统率的甘军进城,要他们屠杀义和团。由于义和团已打入甘军内部,做了不少策动工作,许多士兵还参加了义和团,因而没有执行她的命令。十五日,西太后又连发几道谕旨,调李鸿章、袁世凯来京,也要刚毅赶紧回京。这些措施的目的非常明白,调李鸿章是要这个卖国老手去跟帝国主义勾结,调袁世凯是要这个刽子手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手段推广到直隶来,催刚毅回京则是急于要知道义和团在京外的实力。

谕旨虽然寄发出去了,但李鸿章远在广东,袁世凯也未必离得开山东,因此西太后又急命驻扎在京榆线(北京到榆关,今京山线)上的提督马玉崑,统率武卫左军赴京镇压。还发了一道特急命令给各省督抚,要他们“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就各地方兵力物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还特别强调,京师“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可见,西太后已感到自己坐在一只遇到惊涛骇浪的破船上,所以一再向她的臣仆发出救急的信号。

就在十七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军已攻陷大沽口,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这时又传来一件伪造的外交照会,其中一条说是要“太后归政皇帝”。这是西太后从戊戌政变以来最为担忧的事。一八九九年策划废立时,她就在“上谕”中说,万一系列强

“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就要“敌忾同仇”，胜败如何在所不计了。所谓“万不能允之事”，即指归政给光绪帝的问题。现在西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更为恼火，声称：“彼族焉敢干预予之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立即召开御前会议，要大家议论“开战”。一些王公贵族由于在会前已得知“归政”的消息，个个痛哭流涕，大叫“非战不可”。而另一些大官僚如许景澄、袁昶(音厂 chǎng)、徐用仪之流，听说要同“洋人”开战，却吓得魂不附体，连声不迭地说：“现在各国兵舰云集，万不能开战”，“昔与日本一国开战，尚不能胜，今与各国开战，岂有胜理！”西太后虽一时以“洋人”欺侮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对洋主子毕竟是恐惧的，所以会议最后没有作出肯定的决议来。

此后两天，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一直在吵吵闹闹，拿不定主意。

二十日，刚毅从涿州回到北京，报告了义和团的强大声势。而天津方面的奏报，则是帝国主义联军在攻占大沽后，直趋天津，义和团为了保卫天津，已开始攻打“租界”。天津已处于战争状态。这一天，北京也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德国公使克林德由于向中国人民挑衅被杀，使馆区的外国军队更不断寻衅。义和团开始攻击外国公使馆，以打击侵略者的凶焰。

作为清朝统治集团决策人的西太后，面临这种刻不容缓的紧急形势，是“和”还是“战”，不能不赶快作出抉择。她说：义和团“蔓延已甚，剿抚两难。洋人麇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前一句是说对义和团已“剿灭”不了，后一句是说同“洋人”打起仗来很难预料，以便日后为自己

推卸责任。因为她对帝国主义除了自己说不出口的那种担忧外,更懂得如果公开对帝国主义表示投降,就必须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镇压义和团;但当时北京已经处于不下二十万之众的义和团的控制之下,一旦激怒了义和团,她的统治马上就会垮台。关于这一点,后来西太后有一段回顾的话,说得更加明白,她说:“那时他们(指义和团)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他们一会子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须要查验。’”在对局势作了一番得失衡量之后,西太后决定对外“宣战”,以便躲开人民革命的锋芒。

二十一日,清朝政府向各国公使馆下达“宣战书”。“宣战书”中表面上慷慨激昂,说要与各国“一决雌雄”。但是只隔四天,在答复李鸿章等督抚的“上谕”中,却说:“此次事变,事机杂出,均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二十九日清朝政府拍给出使各国大臣的电报,更彻底暴露了西太后这个老反革命阴一套、阳一套的恶毒手法,她要他们向各国解释说:直隶、山东两省的“乱民”力量很大,她本来想加以“剿灭”,但怕操之过急闯出大祸。并说她即使糊涂到极点,也没

有胆量向各国宣战，哪里敢靠这些“乱民”来得罪各国呢？叮嘱他们向各国保证，今后对公使馆一定认真保护，对“乱民”一定想办法消灭。据英国蓝皮书载称：就在这时，英国公使窦纳乐收到了总理衙门送去的蔬菜、水果各四车，有王公大臣十三人的名片，说是奉“懿（音意 yi）旨”（西太后命令）送去的。这一切，证明了清朝政府的“宣战”只是权宜之计，到头来勾结帝国主义“剿灭”义和团，才是他们的真意。

六、帝国主义策划下的“东南互保”

当清朝中央政府对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中国南部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清朝的地方官僚公开跟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演出了一幕所谓“东南互保”的丑剧。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迅速发展，不仅在政治上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他们沉重打击。那时天津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重要基地，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抵制洋货的革命行动，输进天津的洋货大减。这种情况很快影响到上海，因为帝国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要先运到上海，再转口运往天津。这时，不仅京、津广大群众抵制洋货，销路受阻；而且反帝斗争的风暴遍及各地，经营洋货的商人怕途中发生意外，不敢冒险，因而造成了上海大批洋货积压。由于商品积压，商人不得不削价求售。商人资本大多贷自钱庄，商人失利，钱庄也就岌岌可危。这就大大地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打击了地主、买办的商业利益，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不能说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首先感到这种危险的是英国。因为长江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它在这里的投资最多，商品的输入量也最大，而更使它害怕的是，如果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一旦发展到长江流域来，

不但英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将被摧毁，其它帝国主义也将会借口保护侨民的安全，把侵略势力乘机打入长江流域。英国为了应付这种对它不利的局面，稳住在长江流域占优势的侵略利益，便阴险地采取分裂中国的手法，勾引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并排除其它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插足长江流域。

那时在长江下游的两江总督是湘系军阀刘坤一，在长江中游的湖广总督是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刘、张是两个最有权势而富有买办色彩的总督。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四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打电报给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政府必须立即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他深信刘坤一、张之洞如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有力帮助，“必能尽力维持辖内的秩序”。第二天，英国外交部就回电报，称赞华仑所提的意见是“维持长江秩序最可取的办法”，并授权华仑向刘坤一、张之洞保证，如果他们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兵舰的全力支持。

为了显示“有效帮助”的实力，十六日英国海军部命令在上海的海军将领，派兵舰“赫密恩”号开到南京，“黎乃脱”号开往汉口，传达英国政府的意见，再次向刘、张保证，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实际是通过他们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

本来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刘、张就不断地向西太后表示态度，主张“剿灭”义和团。六月十五日，刘、张进而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要求西太后“明降谕旨，痛剿‘拳匪’”。当时西太后

有所观望，不愿立即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正在这个时候，英帝国主义公开出面支持，刘、张当然喜出望外。十七日，当英国驻汉口领事同张之洞商议有关长江流域的“治安”问题时，张之洞立即表示，他和刘坤一非常愿意跟英国合作。十八日，张之洞同刘坤一电商之后，又电告中国驻英公使，要他向英国政府保证，他们完全有把握在长江流域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切实保护外国的利益。

但是，英帝国主义的行动，却引起了其它帝国主义的妒嫉。美国对刘、张施加压力，表示长江流域不能只受英国一国“保护”。德国表示，长江流域对于列强都应“门户开放”。法国表示，英国如果要“保护”东南，它就要在云南、两广采取同样的行动。在这些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英国被迫让步。于是，策划中的“东南互保”，就由英国独家经营，变为由各帝国主义共同“保护”。

这时，督办芦汉铁路大臣、大买办盛宣怀正在上海，他同英、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同洋务派军阀、官僚更有广泛和深厚的关系。从六月中旬“东南互保”开始酝酿起，他就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在英、美帝国主义领事和刘坤一、张之洞之间，穿针引线，进行具体策划。六月二十一日，清朝政府的“宣战上谕”发出后，谈判活动加速进行。盛宣怀并拍电报给刘坤一、张之洞献计，要他们暂不公布清朝政府对八国联军的“宣战书”，抓紧时机与外国领事达成“互保”的交易。这样，既可以讨好帝国主义，又可以在事后对西太后进行搪塞。二十六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领事

正式会商，炮制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中外反动派初步完成了他们“互保”的勾结手续。

“互保章程”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保护谁？明白地写着要保护“洋人、教堂、教民”，就是保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他们害怕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向南方发展，所以声嘶力竭地叫喊：要“禁止谣言，严拿匪徒”。这完全是一个巩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分裂中国的严重步骤。从表面上看，它与清朝政府的“宣战”好象有抵触，但是骨子里却是一致的。所以清朝政府接到报告后，完全同意刘、张的卖国勾当。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也响应刘、张的行动，加入“东南互保”。于是“东南互保”的范围，就由两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广（湖北、湖南），扩大到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四川、河南、陕西实际上也附从了这种卖国的“互保”。

“东南互保”协议出笼后，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们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与八国联军在北方的疯狂屠杀互相呼应，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的兵舰不断在长江各口岸游弋（音易 yì），监视中国人民的活动。刘坤一把江南制造局新造的枪支和炮船，一齐摆在黄浦港口，并且调集军队驻扎于徐州和皖北一带，以阻止义和团南下。张之洞则大耍反革命的两手，把公开镇压的告示和欺骗人民的“劝民书”，同时张贴在两湖境内各个城镇。美国驻沪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扬子江流域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有中国

当局的布告，命令维持和平。”长江流域的地主豪绅也弹冠相庆，说什么“东南互保”是中国半壁河山的“长城”。

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豪绅，对“东南互保”之所以叫好，是因为它破坏和阻碍了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和发展；同时，使帝国主义没有顾虑地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得以尽快地恢复被义和团打乱了的反动统治秩序。这些正是帝国主义当时所迫切要求的，也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地主、豪绅所迫切要求的。“东南互保”完全适应了国内外反动派的这种要求，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七、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①义和团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年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为了解除这种压迫而进行斗争的。

当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公然闯进中国神圣领土，妄图瓜分中国的时候，义和团挺身而出，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在廊坊阻击战、攻打紫竹林“租界”、围攻东交民巷使馆等战斗中，狠揍了帝国主义侵略军，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九〇〇年六月初，义和团进入北京，公使团向窜驻天津的侵略军呼救。帝国主义各国决定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各国侵略军赶赴北京，屠杀义和团。六月十日，第一批侵略军从天津乘列车出发，第二天、第三天又有列车继续载运这些侵略军从天津开出。

铁路沿线的义和团为了阻止侵略军进犯，立即拆毁了好几段铁轨。侵略军只好一边修路，一边前进。十一日下午，西摩尔和他率领的侵略军正在落堡（音伐 fǎ）车站抢修铁路，突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然间大队头扎红布的义和团群众手持大刀、长矛、木棍，从铁路北侧冲杀过来，侵略军顿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当他们匆忙拿出枪射击时，义和团已经冲到面前，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义和团迎头痛击下，侵略军伤亡惨重。在侵略军刚要败退时，美国侵略军用大炮向义和团疯狂轰击，使许多团众倒在血泊之中。

英勇的义和团群众并没有被敌人的大炮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展开英勇搏斗。十三日晚，侵略军除留下一支队伍守护落堡外，其余都窜犯到廊坊车站。第二天清晨，第一列火车才从廊坊开出十多里，第二列火车还在车站加水，三百多名义和团群众立即将廊坊车站包围，奋不顾身地直逼火车，当即刺杀五名侵略军。当天下午，留守在落堡的侵略军又被义和团包围，动弹不得。西摩尔只好命令第一列火车折返廊坊，又急忙派遣俄、日、英、法四国侵略军带上大炮赶到落堡，才解了落堡之围。

一切反革命势力总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对人民革命的力量估计过低。侵略军从天津出发时，满以为用不了几小时，就可走完这段路程，然后很容易地开进北京城。但是，在义和团逐段阻击下，他们的如意算盘被打破了。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本来只需几小时，他们却花了五天时间，才挣扎到廊坊车站，而且被迫再也不能前进。

自十五日起，侵略军的粮食也没有了，西摩尔派了一列火车驶返天津，搬运给养和物资，然而这时杨村铁路又被义和团拆毁，这列火车开到杨村车站，就不能动弹。趁侵略军进退不



义和团在廊坊痛击侵略军

得之际，义和团在部分清军士兵的配合下，十八日又向困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两小时浴血战斗，又歼灭了侵略军五十多名。

由于遭到义和团一再阻击，这支侵略军由京津铁路窜犯北京的计划完全失败。西摩尔仍然贼心不死，决定放弃廊坊，撤往杨村，再改乘船只沿运河继续向北京进犯。就在十八日的夜里，义和团又一次袭击杨村侵略军营地，打死打伤近四十人。在既无粮食又无救兵的情况下，西摩尔只好逃回天津。

二十日清晨，这些残兵败将抛弃辎（音资 zi）重物资，把两百多名伤兵和一些军火放到抢来的几条船上启运，其它侵略军则顺着运河两岸，慌张向天津逃跑。沿路几乎每过一个村庄，都遭到义和团截击。焦头烂额的侵略军白天不敢走路，只好在夜间偷偷逃命，经过三天，才挣扎到天津的郊区西沽。

在西沽，侵略军占领了清军放弃的军械火药局。被义和团打得狼狈不堪，已经弹尽粮绝的侵略军，在这里获得了补给。尽管如此，那时天津到处是义和团的势力，侵略军还是不敢向离军械局不远的“租界”前进，龟缩在军械局里。直到二十五日上午，因清军中的一个民族败类，偷偷替西摩尔向天津“租界”送信，帝国主义派出两千多名侵略军到西沽，才把这些残兵败将接到“租界”。

西摩尔这支用大炮、机关枪等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侵略军，却被只有大刀、长矛等旧式武器的义和团打得溃不成军，他们在短短六十公里的铁路线上，竟推磨了半个多月，两千多名侵略军伤亡了近三分之一，最后惨败逃回天津。后来，西摩

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大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天津义和团发动攻打紫竹林“租界”的战斗，在大沽失陷前就开始了。

位于天津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是英、美、法强占的“租界”。围攻紫竹林“租界”的战斗，完全是由八国联军的侵略引起的。六月十三日，义和团前往天津火车站，沙俄侵略军竟然用十五门大炮向义和团轰击，团众被炸死了三、四百人。这种野蛮残暴的行为，激起了义和团的无比愤怒，于是立即出动大队向“租界”发动猛烈进攻。

六月十七日，帝国主义武装夺取大沽炮台。这一消息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一部分清军在义和团的影响和推动下，也参加了攻打紫竹林的战斗。

紫竹林“租界”被义和团包围，使帝国主义惊慌万状。它们急急忙忙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城，以解救正在危急中的紫竹林“租界”，并企图控制老龙头火车站。

老龙头火车站，是天津通往北京的车站，是帝国主义沿铁路线运兵到北京的必经之路。这个车站在紫竹林的对面，要取得跟“租界”的联系，必须首先控制车站，否则紫竹林“租界”便会处于绝境。

义和团深知这个车站的重要性，因此，在车站附近部署了很强的力量。当时，大南河的义和团首领伟以礼所部团众，在海关大道扎营，义和团另一首领孙国瑞等领导的团众活动于海河两岸，对车站和“租界”形成了包围圈。

六月十六日,两千多名沙俄侵略军,带着马队和大炮窜犯到老龙头火车站。驻扎在娘娘庙的义和团发觉后,立即持刀奔赴车站。沙俄侵略军看到义和团冲上来,慌忙架起大炮轰击,但是义和团没有被敌人的密集炮火吓住,勇敢地冲上去。在义和团的打击下,沙俄侵略军纷纷弃炮逃向俄国银行。他们为了获得喘息的时间,挂起白旗,假装求和。义和团识破了这一诡计,拒绝他们的要求。这时,天津城里三里庙、南台子等处的义和团,在曹福田的率领下,也赶往车站支援。

曹福田,河北静海人,行伍出身。一九〇〇年春,他活动于静海、盐山、庆云一带,随后设“坛”天津城内,是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之一。当曹福田率领的团众路过铁路时,沙俄侵略军又开枪射击,妄图阻止他们前进。这时,一个义和团首领手持宝剑,勇敢地越过铁道,大喊一声:“弟兄们,冲上来呀!”团众奋勇冲上,在清军士兵配合下,杀



义和团首领曹福田

得沙俄侵略军丢盔弃甲，抱头鼠窜。义和团胜利地收复了车站。这一仗，两千多名沙俄侵略军，被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附近群众获得义和团胜利的消息后，连夜送来了得胜饼、绿豆汤，祝贺义和团大捷。

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军继续向天津增兵，义和团一方面将从大沽到天津的铁路拆毁，一方面要裕禄报告清朝政府，增派清军。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根本不愿抗战，拒绝派兵救援天津。而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却源源开进紫竹林“租界”。就是由于这支侵略军开到，他们才能拨出一部分兵力，把西摩尔从西沽的围困中解救出来。

侵略军不断侵入天津，而清朝政府却袖手旁观；义和团为了打击侵略军，保卫天津，纷纷向天津集结。六月二十七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向侵略者下战书。然而，帝国主义毕竟是色厉内荏（音忍 rěn）的纸老虎，他们不敢应战，仍旧龟缩在“租界”里负隅顽抗。就在这天，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率领团众五千人，分乘七十二只大船，从独流镇浩浩荡荡来到天津，投入天津的战斗。张德成，河北静海人，船夫出身。是独流镇的义和团首领，所辖义和团称为“天下第一团”。

张德成的到来，给义和团在天津的反帝斗争增加了一支强大力量。他们便高举大旗，向“租界”发动正面进攻。七月一日，张德成亲自指挥攻打紫竹林“租界”，并占领了浮桥，鏖（音熬 áo）战五个多小时，直攻到英、法“租界”交界处，烧毁了帝国主义的许多洋房，凯旋而归。与此同时，曹福田率领的团众和部分清军，分路向火车站发动进攻，战斗持续达两昼夜。帝国主

义侵略者发出了绝望的嚎叫：“联军在天津被围，络绎不绝，或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或处于将寡兵微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呈现出垂死挣扎的狼狈相。

在攻打紫竹林的战斗中，义和团不仅勇猛顽强，而且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帝国主义侵略军为了阻止义和团的进攻，在与天津城接壤的紫竹林一带巷口埋下许多地雷。义和团如果硬打硬拚，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张德成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叫人牵来几十条牛为前驱，将所埋的地雷破坏，大队义和团随即冲上前去，直攻到海关大道，把帝国主义的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全部焚毁。天津的战斗已进入最高潮。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清朝政府露出了它的卖国贼嘴脸。清朝政府的对外“宣战”，本来就是一个骗局，所以当帝国主义不断增兵，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威胁相对减轻的时候，他们立刻显出了原形。七月上旬，清朝政府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他搭乘俄国船迅速北上，准备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又调宋庆为北洋帮办军务大臣，把炮口指向义和团。十三日，宋庆下令屠杀义和团，天津的义和团遭到严重摧残。帝国主义趁这机会大量增兵，裕禄、宋庆不但不设法抵抗，反而弃城逃跑。十四日，天津陷落。帝国主义随即在天津设置“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这个“都统衙门”直到一九〇二年八月才撤销。

在天津方面展开反侵略激战的同时，北京的义和团也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了总进攻。

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帝国主义侵略者就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经常无故枪杀义和团群众。德国公使克林德就是刽子手之一。有一次，他带领一队水兵走到内城城墙上，看到城墙下的沙地上有许多团众在练武，就公然命令水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二十多人。行凶后，这个刽子手还叫嚣：“这是在东方做事唯一的法门。”六月十九日，帝国主义侵略军竟把东交民巷和东长安街一带封锁起来，作为“占领区”，推举英国公使窦(音豆 dòu)纳乐为帝国主义使馆的总司令，强迫居住在界内的居民迁出或闭门不出。美国公使康格供认，在六月二十日以前，使馆中的侵略军至少已经屠杀团众百名以上。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军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大举进犯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更加激怒了人民群众，北京义和团决心以武装战斗来回击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略。

六月二十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向中国人民挑衅，当场被群众打死。使馆侵略军借此大发作，义和团便出动了五、六千人对使馆发动猛烈的进攻。他们从东西两面一齐攻击，抛掷火炬和火药包，比、奥、荷、意等四国使馆顷刻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迫使侵略军不得不退守第二道防线。接着，义和团又在长竿头端缠棉絮，浸煤油，点燃为火炬，伸向使馆的屋顶，使其延烧，以掩护大队进攻。七月十三日，团众和少数清军士兵攻入法国使馆，并一度攻入德国使馆，经过一场白刃战后才撤退。法国公使毕盛哀叹，“陈设俱成灰烬”。尽管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义和团始终斗志昂扬，以无

所畏惧的勇敢精神和敌人相对抗。一些爱国的清军士兵，也投入这场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帝国主义侵略者想出了种种办法，抵挡强大的攻势，但是在义和团勇敢而机智的进攻面前，都不能得逞，只好发出“前途无法预料”的悲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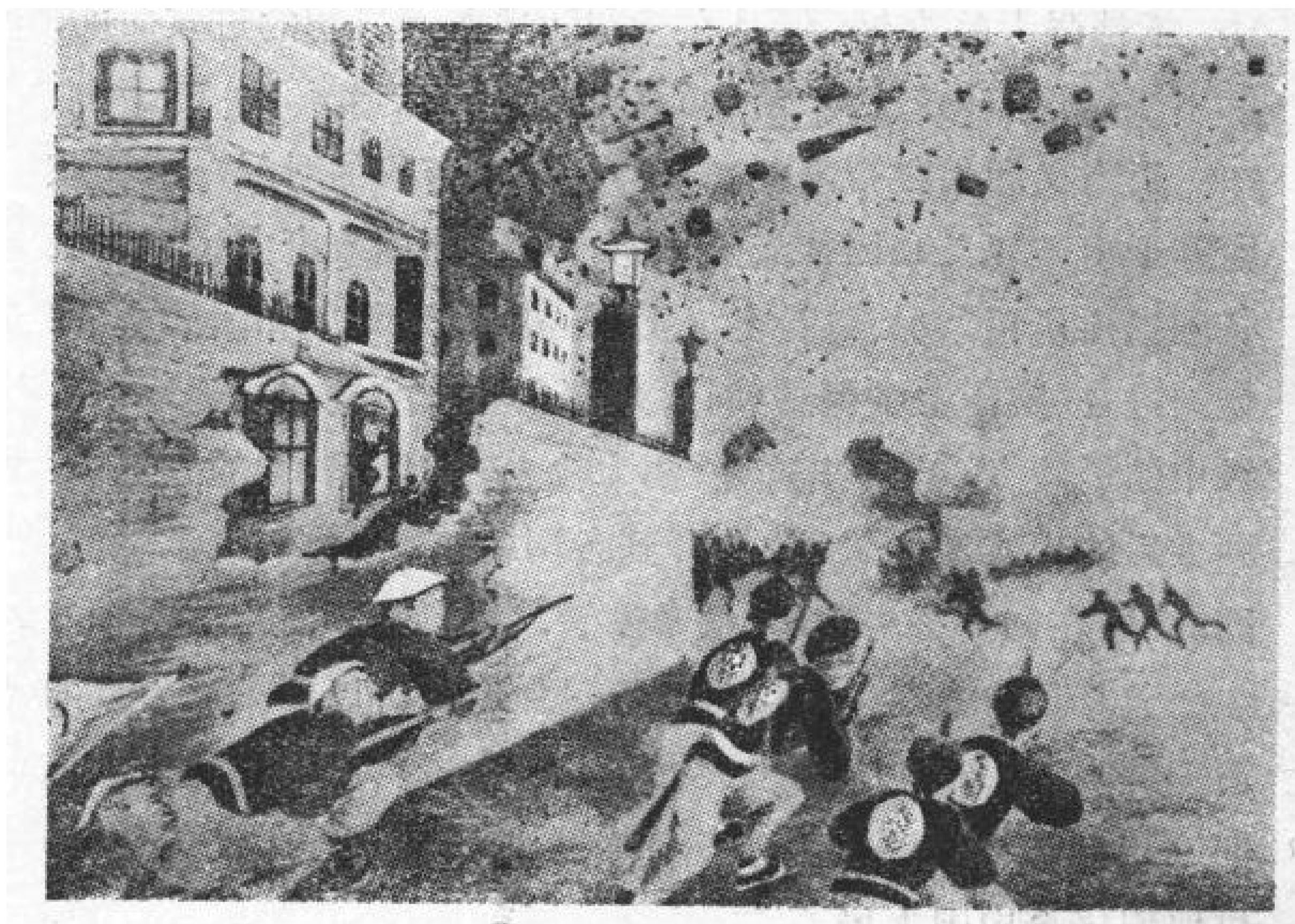
正当义和团跟帝国主义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干出破坏义和团抗战的罪恶勾当。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各国提出所谓“宣战”后，名义上派一些清军与义和团配合，向使馆进攻；实际上是保护使馆，牵制义和团的进攻。连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看出这是“明为攻击，暗则保护”的鬼把戏。西太后的忠实走狗荣禄，公开到各国使馆，向他们表示慰问。同时，还在御河桥头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粮尽弹绝时，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却派人送去大批面粉、大米、水果，向他们慰问。而荣禄的武卫军则半公开地把弹药卖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供他们屠杀中国人民。

西太后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如此爱护备至，对义和团却百般刁难，甚至公开屠杀。在“宣战”后的第三天，清朝政府立即命令大官僚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加紧控制，并制定所谓“团规”，规定义和团必须服从“团总”的统率等。还提出违背“团规”进行反抗的就是“假团”，“假团”照“匪徒”办理，格杀勿论。清朝政府就在“假团”的名义下，屠杀了很多义和团群众。

为了进一步削弱义和团的实力，清朝政府还假借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名义，不断把在北京城里围攻使馆的义和团调离北京，使北京城里义和团的力量一再遭到削弱。

义和团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战斗。



义和团在法国使馆埋设的地雷爆炸

他们在进攻过程中，还采用了地道地雷战术。有一次挖掘地道的十三个人全部牺牲，后面的人立即补充上去，继续工作。地雷战使侵略者遭受很大的损失。一个法帝国主义分子怀着恐惧的心情描写说：“有一次，围中人忽然听得有很沉重的声音在脚底下响，懂得这是中国人在安地雷，希图把我们炸翻。防御的方法自然只有从使馆里反凿地道下去，填塞外面的来路，然而终于是防不胜防。一天中午，在两声怕人的爆响中，法国使馆从地上飞起来了。”帝国主义分子每听到地下

的“铲锄之声”，就胆战心惊，担心自己被“炸成飞灰”。到七月二十日止，使馆里的侵略军，五十六名法军中死伤四十二人，五十四名德军中死伤三十人，六十名日军中死伤四十五人，俄、美、英、意、奥等国侵略军，也都有不少伤亡。在义和团的沉重打击下，使馆里的侵略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听到这种声音，可以使人的血凝而不流”。

义和团在攻打使馆的同时，还向帝国主义进行宗教侵略的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

西什库教堂是天主教的大主教所在地，当北京其它三个教堂被焚毁后，义和团就紧紧包围了西什库教堂。西什库教堂里的侵略军不过六百名，义和团多次进攻都没有得手，主要原因是清朝政府的破坏。清朝政府多次下令，不准用枪炮轰击，还派军队加以保护。

由于清朝政府的破坏，使馆被义和团围攻了五十六天，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了六十三天，都没能攻下。西太后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处处都留着余地，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这句话，完全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卖国贼嘴脸。

七月十四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还不敢贸然向北京进犯，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到八月二日，才拼凑了约四万名侵略军，以日、英、美三国侵略军为左路，法、俄、德、奥、意五国侵略军为右路，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抵抗和还击。八月四日北仓一战，侵略军被歼灭一千多，八

月八日杨村一战,侵略军又遭重创。直到八月十三日,才进犯到北京郊区。八国联军中的日本侵略军窜犯到朝阳门、东直门一带,想从这里爬城,义和团毫不犹豫地奋勇抵抗,没有武器就用石块打。而城里的清军旗兵“神机营”、“虎神营”,听到侵略军来到,相隔三十里就逃跑了。董福祥更在城破时纵兵大掠。八月十四日,日军从朝阳门攻入,俄军从东便门攻入,英军从广渠门攻入,其它侵略军相继窜入北京,北京就这样失陷了。

北京失陷时,西太后带了光绪帝和她的亲信臣仆,仓皇从紫禁城逃走。临行,光绪帝的妃子珍妃要求光绪帝留下来,以便和帝国主义取得联系,恰好触犯了西太后的大忌,西太后叫太监把珍妃投入宫中的深井。珍妃想求救于帝国主义的这种卖国丑行,就是曾经被刘少奇吹捧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重要情节。

西太后在逃经山西、前往西安的途中,一方面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就是要李鸿章赶快投降,放手卖国;另一方面则叫嚷对义和团要“勒令呈缴军械”,“痛加铲除”,还向八国联军请求“助剿”。

西太后的“宣战”花招,这时便完全拆穿了。

八、强盗的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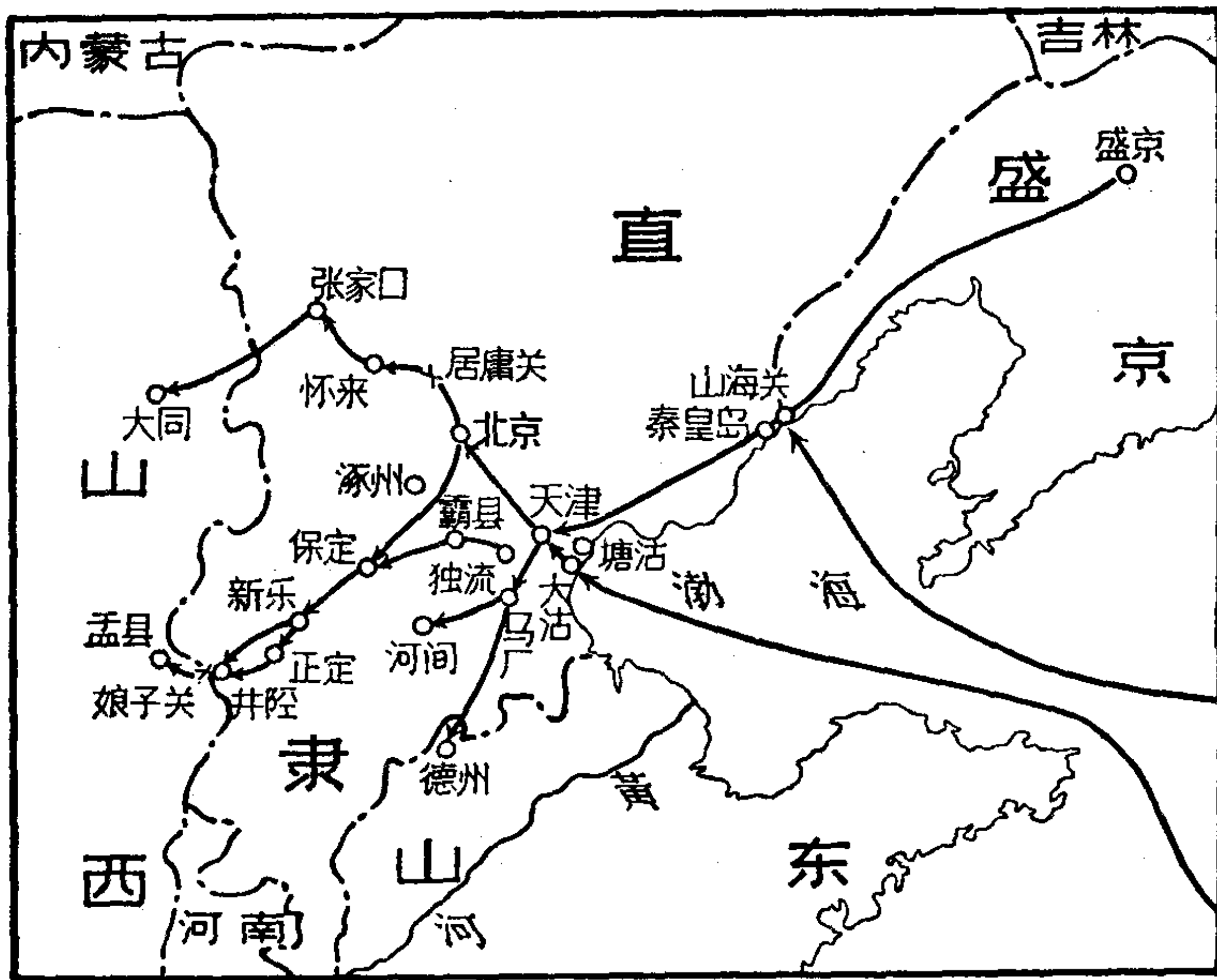
帝国主义侵略者纷纷派遣军队到中国来进行侵略战争，它们感到联军没有一个总司令，不能协调侵略步骤，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本来，各国侵略军进兵天津时，曾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担任总头目，但廊坊一役，西摩尔已成为义和团手下败将，所以决定另择人选。八月初，德皇威廉二世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为理由，向各国提出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这个建议首先得到沙俄的赞成，因为沙俄认为由德国担任统帅，总比由它的对头日本或英国担任好。同时，英、日也不愿意来一个沙俄统帅，法国对沙俄也有所顾忌。所以几国议定后，决定由瓦德西担任统帅。一九〇〇年九月下旬，瓦德西到达天津。这时各国增调来华的侵略军，总数已近十万人。

为了向清朝政府进行最大的勒索，联军在占领北京之后，又分兵四路，攻占北京外围的战略要地。

一九〇〇年九月，德、俄侵略军首先沿京榆线向东侵犯。山海关当时驻有清军七千多人，本来还可以支持，李鸿章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竟下令山海关守军自行撤退，使俄、德侵略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山海关。

另一路帝国主义侵略军从北京沿芦汉线向南侵犯，矛头直指保定。北京陷落时逃到这里来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扬言要收复北京，但当他听到联军进犯保定的消息后，又立即逃到山西去了。

一九〇一年春，侵略军又由保定向西侵犯，直至获鹿、井陘(音形 xíng)等地。腐败的清军照例是不抵抗，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让帝国主义铁蹄任意践踏。但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义和团前堵后截的袭击下，在占领固关后就被迫逃回。



八国联军进军路线图

向北侵犯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经居庸关向张家口行进。

马玉崑率领的清军不仅不抵抗，反而在前面干驱逐义和团的勾当。帝国主义侵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四出烧杀抢掠，但是都受到义和团的英勇抗击。德军向怀来侵犯时，连统领约克也送了命。联军头目瓦德西原来还预备到南口附近的明陵去大抢一番，听说约克毙命，吓得不敢再去了。

这些侵略军是大群蒙着“文明”之皮的野兽。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无恶不作，所到之处无不遍地火光，尸骨成堆。

北塘本来是个有一万多户人家居住的大镇，在沙俄侵略军的烧杀下，老百姓死去大半，鲜血把运河的水都染红了。天津城失陷时，日本侵略军把炮架在北门城楼上，对准居民稠密的市区轰击。法国侵略军在北京城里看到一队中国老百姓，就把他们逼到一个死胡同里，然后架起机枪扫射，连续十五分钟，直到全部死亡为止。德国侵略军头子曾下命令：“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帝国主义分子赫德供认：德军“占领区里，已成人间地狱了”。

北京城里的房屋，只要是设过“拳坛”的，统统被放火焚毁。法帝国主义分子绿蒂对被毁坏后的北京城，曾经有这样一段记载：“城里的寂寞和荒凉，也正和城外一样，除了残毁、残毁、残毁之外，是再没有其它东西了。这是一座残木和剩灰的城，这尤其是一座破瓦和断砖的城。灰色的、细碎的砖瓦到处都可看到，从前是高大的屋宇，现在变成砖瓦场了，从前是平坦的道路，现在也变做砖瓦场了。一座昔日充满辉煌金漆

房舍的北京城，现在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的残物的荒野。”这种情景，何止北京一地，从塘沽到北京，凡八国联军经过的地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瓦德西直认不讳地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至少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

抢劫更是强盗们的惯技。一个英国侵略者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抢掠的情景说：“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和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马上一脚踢开。”这些强盗还跑到“造币厂、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任意拿取他们所喜爱的东西”。

侵略军占领北京后，命令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始终没有停止过。瓦德西又招供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

英国侵略军对于抢劫特别擅长，每一个士兵所抢来的财物，都堆在公使馆里，然后公开拍卖。赃物卖完了，所得的赃款按官职大小分摊。

沙俄侵略军最野蛮。他们抢到所需要的东西之后，对用不上、搬不动的东西，就统统打得粉碎。一个沙俄军官，“回国时，行李之外，并由北京带归十大箱子，装满各种贵重物品”。

日本侵略军在天津一个地方，就抢到两百多万两银子，他们把这些抢来的财物，全缴归他们的军国主义国家。

德国侵略军最凶横。每天天刚黑,就出来抢劫,还恬不知耻地公开说:“我们皇帝在训词里叫我们这样干的,我们出来抢劫,不过是服从命令罢了。”

美国、法国侵略军对于抢劫,也“绝对不曾落居人后”。但美国侵略者极为狡猾,表面上装着“文明”的样子,假惺惺地禁止士兵抢掠,实际上却在使劲地抢。仅从天津盐道衙门抢走的银子,堆起来就是一座“三十英尺高,三十英尺宽”的“银山”。美国侵略者的这种“文明”,当时就被其它侵略者拆穿了。一个叫兰德尔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看到美国报纸上吹嘘美国军队“是唯一绝对没有进行抢劫的士兵”时,说:“这一次关于美军情况的报道,特别不可信。在抢掠方面,美军确实并不比到场的其它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是也决然不比他们更好一些。”“如果抢掠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的话,那末,各国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同样地失了体面。俄军、英军、美军、日军、法军都同样地进行抢掠,他们中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流的抢掠能手。”

不仅帝国主义的侵略军疯狂抢劫,就是那些口诵“福音”的传教士,也在这时趁火打劫,大发横财。法国主教樊国樑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到清朝大官僚立山家里一次抢走了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到沙滩附近一家粮店里,把里面储存的小麦、小米及其它杂粮,一下抢走了两万多斤。

这些传教士除了自己动手抢劫之外,还给侵略军作屠杀、抢劫的向导。当时一个法国侵略者招供说:“我们从北堂开向清朝的皇宫,传教士跟在我们后面。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掠,

做我们的向导。”

在这场浩劫中，不仅许多中国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清朝统治者多年搜括、聚集的大量财宝和珍贵文物，也被劫毁殆尽。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日军分占清朝皇宫，将宫中珍品捆载而去。中南海仪鸾殿，俄军窜入，劫走大量宝物，其它物件都被打得粉碎。随后，联军头子瓦德西进驻这里，他供认皇宫内“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及院落之内”，建筑物则“横加劈毁”。颐和园所珍藏的宝物，也被帝国主义强盗用骆驼队装运到天津“租界”里去，运了几个月。

代表中国民族悠久文化的历代文物，如古铜、古瓷、玉器、雕刻、仪器、书画等等，被它们劫夺和毁坏的，不知有多少！例如北京天文台直径两公尺的天球，以及四分仪、六分仪等，都是十七世纪设制的古铜仪器，德、法两国强盗都要抢夺，结果只好分赃，一部分归德国，一部分归法国。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剩下的《永乐大典》（明朝永乐年间辑成的一部大丛书），这次又被抢去三百零七册。据统计，这次共被抢去珍本书籍四万六千余册。

在侵略军的抢劫和破坏下，中国人民蒙受的损失极其惨重。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中国此次的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强盗们因此大发横财，他们在装满了箱篋的同时，还把北京变作拍卖市场。瓦德西也说，买卖赃物的生意“极为隆盛”，“各国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已到处经营，获得巨利”。拍卖的大多



义和团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是中国历代珍贵文物，这些无价之宝，以贱价落入美、英等国的商人手中，他们从中捞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帝国主义侵略军所到之处，除了烧、杀、抢劫，还大肆奸淫。他们在北京把掳掠来的妇女，集中在裱背胡同，作为“官妓”，就是无数罪行中的一个例子。一个强盗招供：“强奸妇女”，“为数极属不少”，因而迫使许多妇女自杀。

所有这些暴行，就是自称具有“西方文明”的强盗干出来的，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文明”和“理性”的行动！可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混淆视听，掩饰他们的暴行，竟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中国人“损害外人生命和破坏财产”，“不文明”，咒骂义和团是“排外骚扰”、“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①铁的事实证明，真正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跑到中国来侵略、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强盗。他们横暴地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他们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民，他们疯狂地掠夺中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才是不折不扣的匪徒！

^①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九、沙俄侵占东北

沙俄参加八国联军闯入京、津地区，在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

沙俄过去虽然已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大片中国领土，攫取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但是，贪得无厌的老沙皇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并吞东北，以实现其“黄色俄罗斯”的殖民主义计划。

沙皇政府为了镇压义和团和侵占东北，在他们国内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民族沙文主义，胡说什么中国出现了“暴乱”，出现了“黄祸”。尼古拉二世叫嚷要把“保卫欧洲免受黄种人侵犯，看做一种光荣的事”。这些无耻的谎言，当时就遭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有力抨击。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严峻地指出：正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而沙皇政府在几年以前，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侵占满洲，“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①揭露了沙皇政府对中国人民张牙舞爪的狰狞面目。

一九〇〇年七月，沙俄以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烈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六页。

火燃烧到了东北，借口要保护它正在强建的中东铁路，调集步兵、骑兵十七万七千多人，趁当时中国被侵略的形势，分六路入侵东北：一路由外贝加尔，经呼伦贝尔，越西兴安岭南下；二路由海兰泡渡黑龙江攻瑗琿，经墨尔根，直趋齐齐哈尔；三路由伯力附近溯松花江，经三姓（依兰），直趋哈尔滨；四路由尼古拉斯克攻绥芬河，会师哈尔滨；五路由海参威附近攻琿（音浑 hún）春、宁古塔，直趋吉林；六路由旅顺攻营口，经辽阳，直趋奉天（沈阳）。

沙俄侵略军虽然来势汹汹，富有斗争传统的东北人民并没有气馁，在许多地方仍然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当侵略军向瑗琿进犯时，义和团高举着“大拳民”的旗帜，手持刀矛，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不少爱国的清军也投入了战斗。八月上旬，侵略军进攻盖平、海城，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士兵的有力还击，在海城郊外多次被打败。在三姓的一次战斗中，三姓人民击毙了沙俄侵略军的团长文尼阔夫。在宁古塔，由于民团武装——镇东军的奋起抵抗，使沙俄侵略军久久不能得手。

但是，清朝政府在东北的大官员盛京将军、吉林将军，不但不抵抗沙俄侵略军，反而对英勇抗战的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屠杀，这就大大地便利了沙俄侵略军的进攻。因此，沙俄侵略军自七月中旬强渡黑龙江、攻陷瑗琿开始，各路相继出动，先后攻占宁古塔、海城、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到十月一日夺取了奉天，东北三省便全被沙俄侵略军侵占。

野蛮的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罪恶滔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夺去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中，北岸

的“江东六十四屯”，仍属中国管辖的中国居民区，沙俄久已视为俎（音阻 zǔ）上肉。在这次进军前夕，竟把六十四屯的居民逐聚江边，惨加屠杀，又把来不及屠杀的大部分居民驱入江中，男女老少六千人几乎全被杀死或淹死，生存的仅两百多人。又在渡江进攻瑗珲时，把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瑗珲县城烧成一堆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地声讨了沙皇政府的暴行，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① 据不完全统计，沙俄侵略军在瑗珲、珲春、三姓、海拉尔、漠河等地屠杀的中国老百姓，不少于两万人。

沙俄侵略军在对东北人民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为了使占领“合法化”，把盛京将军增祺捉去，以刺刀胁迫他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签订了出卖东北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无理地规定沙俄在奉天设置总管，控制东北的行政，把清朝政府设在那里的官署变成一种对沙俄负责的机构，其作用只限于维持地方秩序。

沙皇政府的外交、财政、陆军大臣，还偷偷地在彼得堡炮制了一个名叫《俄国监理满洲原则》的黑文件，更肆无忌惮地要清朝政府“放弃其在满洲之军备权”，沙俄阿穆尔军区和关东军区对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有权“监理”，中国不得派兵在东三省的边境设防。充分表明沙皇妄想一口吞下中国东北领土，把中国东北三省继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大片土地，再划入俄罗斯版图。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六页。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传出后，立即遭到中国人民激烈反对，清朝政府也被迫不予承认，给增祺以革职处分，委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代表，与沙皇政府交涉。一九〇一年二月，沙皇政府向杨儒重新提出交收东三省条件十二条，以代替上述“暂且章程”，这个新约比旧约还要狠毒，不仅囊括了东北的主权，还要夺取蒙古、新疆的路矿权利，并要由东北修筑一条穿过长城直达北京的铁路。沙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挥舞霸权主义的大棒，企图趁联军纷扰、中国穷于应付的时机，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它对东北的霸占，并扩展其势力。

各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沙俄独占的侵略计划一旦得逞，将危及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纷纷出面阻挠。日、英、美、德等国接连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反对在共同议订的《辛丑条约》之外，有同其它国家缔结任何有关“领土性及财政性”的局部协议；并且以各国将纷起仿效，各自霸占中国的领土相威胁。日本和英国对沙俄的争夺，尤为剧烈。沙俄看到这种形势对自己日趋不利，更担心日本和英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对杨儒进行种种要挟，逼他在条约上签字，想尽快结束谈判，把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固定下来。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继续以战斗回击沙俄的侵略阴谋。一九〇〇年以来，东北人民和义和团组织“忠义军”数万人，最盛时达到二十万人，在刘永和的率领下，响亮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跟沙俄侵略军进行英勇搏斗，曾多次打败沙俄侵略军的“围剿”。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支沙俄侵略军由吉林出发到海龙去镇压“忠义军”，“忠义军”采取灵活的

战略战术,有时白天埋伏起来,趁云阴月黑的夜间,突然袭击俄军的巢穴;有时组成阻击队,在俄军军营四周埋伏,另一部分武装部队从远处鸣枪,把俄军引出来打,给以重创。连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在东北常有武装完备的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沙俄陆军大臣也招供说,他们的军队经常“被围困在敌视我们(沙俄)的中国群众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其它反俄势力的影响,尽管沙皇政府进行了种种诱迫,西太后、李鸿章又命令“酌予画押”出卖东北,驻俄公使杨儒终于没有在交收东三省的条件上签字。

沙皇政府在彼得堡策划的谈判没有得逞,只好暂时收起它的“黄色俄罗斯计划”,发表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为它出兵东北的暴行进行辩护。但到一九〇一年九月,清朝政府同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各国从京、津撤军。沙俄看到别国插手的压力减少了,又把侵略东北的条款修修补补搬到北京来谈判,想再借李鸿章之手来将它实现。不料李鸿章这个老卖国贼,正在活动签字时就病死了。李鸿章临死前一天,沙俄代表还催着要他签字呢!因此,李鸿章一死,沙俄代表向沙皇政府惊叫道:“一切都完了,我们必须再从头开始!”拖到一九〇二年四月,由于中国人民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拒俄声浪,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有发展,英国和日本已结成同盟进行抵制,沙俄不得不同清朝政府签订从东北分期撤兵的条款。东北的交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沙俄侵占东北的狼子野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仍然拒不撤兵,后来中国人民因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拒俄运动。

十、《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入侵以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在内外矛盾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被迫“宣战”，其实无意抵抗，随时准备投降。天津陷落前，清朝政府就电令驻日、英、德三国公使，分别向三国君主呈递国书，请求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挽回时局”；又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要他北上同帝国主义周旋。天津陷落后，清朝政府的求和活动表面化了，一面致电法、德、英三国，请求调解；一面又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请求各国先行停战，进行谈判。

但是，清朝政府这些迫不及待的求和表示，帝国主义各国都置之不理，它们的野心和贪欲很大，决定攻占北京。当联军窜到北京后，西太后率大小喽罗逃跑时，为了加速投降步骤，又派清朝贵族庆亲王奕劻(音亦匡 yìkuāng)，协同李鸿章向帝国主义乞和，并授权李鸿章在干卖国勾当时可以“便宜行事”。经过两、三个月的曲折，清朝政府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基本路线明朗化了。

帝国主义各国联合发动这次侵略战争，只要有可能，它们是想瓜分中国的。但是，它们受到义和团铁拳的打击和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而它们之间也存在争执和冲突，这样，

瓜分的迷梦破灭了。帝国主义瓜分的阴谋不能成功，它们对清朝政府这个一向很忠顺的奴才，这次竟敢闹别扭，不免大为生气。但是，清朝政府的种种表示，充分证明它仍然是帝国主义最驯服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决定维持清朝帝国的表面完整，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使清朝政府彻底成为它们的傀儡政权，这是最行得通而又比较保险的办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针确定后，就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谈判要求，开始了另一场互相争夺的丑剧。

因为，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虽有共同的侵略目标，另一方面又各有自己的打算，在议和中矛盾重重。首先，帝国主义各国对李鸿章的全权代表地位发生了争执。李鸿章历来办理卖国外交的秘诀，是所谓“以夷制夷”。甲午战争以后，他一意主张“联俄”，为沙俄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沙俄纠同联军进攻北京，一九〇〇年七月，又趁机出兵侵占东北三省，李鸿章竟然认为这是请沙俄出面调停的“大好时机”。所以沙俄最先接受李鸿章为清朝政府的议和全权代表。沙俄和李鸿章的勾结一向受到英、日的疑忌，英、日尤其害怕清朝政府承认沙俄对东北三省的独占，因此竭力在清朝政府中扶植亲英、日势力，对亲俄的李鸿章的全权代表地位，采取否认的态度。德国害怕妨碍它实现预定的掠夺计划，支持英、日。沙俄遭到英、日、德的抵制，就设法取得美国的支持。经过一番交易，终于以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加和议为条件，各国才同意和李鸿章开议。

十月十六日，清朝政府议和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向各

国代表提出了一个和约草案，各国公使因为草案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不予理睬，声称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达成协议前，不和奕劻、李鸿章会谈；并且提出，清朝政府只许在条约上签字、画押，没有什么可以谈判、商量的余地。奕、李两个卖国贼，见主子发怒，诚惶诚恐，连忙拜见联军头目瓦德西，乞求早日开始和议。

逃亡到西安的清朝统治者，一直焦急地等待帝国主义提出谈判条件。以西太后为首的一小撮民族败类，抱定了这样的主意：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的条件都可以接受。因此一再电令奕劻、李鸿章，议和“可成不可败”，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千万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的统治。

帝国主义方面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美、英、俄、日、德、法、意、奥八国外，加上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三国）向清朝政府提出联合照会，声称这些条件都是“无可更改”的。奕劻、李鸿章也附和说：各国“会商已成，翻腾不易”，盼望清廷早日批准。十二月二十七日西安电复奕劻、李鸿章，明确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这样，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没有经过任何谈判，和约的内容便已基本确定，活现出了帝国主义的强横霸道和清朝政府的奴颜媚骨。

“议和大纲”十二条出笼以后，才开始正式议和谈判。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已无所谓谈判，只是接受条约罢了。不过由

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主要的谈判倒是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进行。它们激烈争吵的焦点，集中在勒索赔款如何分赃的问题上。帝国主义之间你争我夺，谈判几乎破裂。

首先，是在赔款的数目上的争吵。美国提出四千万英镑这个赔款总数，各国按所谓“损失”比例进行分摊。美国的算盘是，“充分的赔款远不及逐步推进对华贸易为重要”。美国在赔款中所占比例较小，乐得装出“宽大”的样子，博得清朝政府的好感，以便今后取得更大的特权，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国和美国采取同样立场。那时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最大，它首先考虑到，“一笔由关税厘金中提供的沉重赔款对英国商业的影响”，主张把赔款的数目限制在五千万英镑以内。美、英的方案遭到德、俄的强烈反对，德、俄特别注重尽快向清朝政府榨取一笔相当可观的赔款。因为，德国指望利用这笔赔款，扩建它的海军和英国竞争；沙俄则准备用赔款来加速西伯利亚铁路的建筑，巩固它在远东的侵略地位。经过一场争吵，各国要求赔偿的总数，最后定为六千七百五十万英镑，即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其次，是关于赔款偿付方法的争吵。沙俄想尽快取得全部赔款，主张清朝政府向国际金融资本家借债，由各帝国主义担保。法国表示同意。可是沙俄的办法提出后，却遭到其它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反对。英国借口大家担保借款，就一定要共同管理中国的财政，这和“尊重中国行政完整”的原则不合。实际上，是因为清朝政府最大的税收机关——海关，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各国共同管理中国财政，势必打破英国的独占利

益。最后，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商得德国的同意，提出了分年摊还的办法。后来条约上规定的中国发行债券，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就是英国提出、德国修正的办法。

经过一年多争吵，帝国主义之间最后达成协议。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与美、英、俄、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的代表，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身契——《辛丑条约》。除正约以外，还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内容是：

一、勒索巨额赔款。赔款总数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加上三十九年分年摊还的利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还有各省的地方赔款至少在两千万两以上。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大规模的敲榨勒索，是最大的一次赔款，历史上称为“大赔款”。因为是在旧历庚子年订约的，也称“庚子赔款”。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忘形地叫嚷：“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条约规定，赔款以关余、盐余（关税和盐税收入在分还外债后的剩余部分）和常关（清朝在水陆交通要道或商品集散地设立的税关）收入三项税收作为担保，各通商口岸五十里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海关和盐务税收机关，完全成为代帝国主义收款的机构，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关税的控制，又从“洋关”而扩及于常关。

二、武装监视清朝政府。条约规定，把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大沽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外国派兵驻守。这样，帝国主义侵略者扫清了通往北京的道路，从此可以横行无阻，随时对清朝政府施

加军事压力。又规定,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或驻扎,使天津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监视清朝中央政府的军事基地。

三、建立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使馆区”。条约规定,在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不许中国人民在这个区域内居住,而帝国主义在这里可以自行设置军队,完全是“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策划政治阴谋、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大本营。

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条约规定,凡赞助过义和团的官吏予以惩罚,凡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考选文、武官员五年。并限令清朝政府,以后民间组织反帝社团,必须“尽法惩治”,各地官吏必须负责镇压,否则“一概革职,永不叙用”。

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把它们侵略军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设置具有殖民政府职能的“使馆区”,将清朝政府完全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而且,想以惩办官员、停止考试、禁止民间反帝社团等恶毒手段,从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运动,以达到它们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西太后,却感激涕零地说:“我们应该感谢各国对我们的谅解”,无耻地扬言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以此来制定和推行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清朝统治集团面前,已经没有民族界限,他们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营垒。

《辛丑条约》签订后，西太后向帝国主义赎了罪，取得主子的“欢心”，现在她又要“驾返”北京来“光复”她的皇威了。一九〇一年十月六日，西太后随带行李车三千辆，同光绪帝及大小喽罗离开西安，出潼关，经河南、直隶，于次年一月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修蹕（音毕 bi）路（皇帝经过时平铺黄土的御道）、设行宫，仅洛阳一地的修缮费就花了三万两；还大索供应，远近征调，走一路就给人们制造一路的灾难。正定人民在蹕路旁散发的揭帖中写道：

洋兵入境后，屋产劫火焚。今年赔款大，剥削我黎民。……
今时皇差大，官吏馋狼奔。敢近蹕路行，罚银三千金；临蹕路左近，拆屋且毁坟。

对八国联军的暴行，对《辛丑条约》的勒索，对西太后一群盗匪的残民以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打；“馋狼奔”三个字，更刻画出西太后一群贪婪、凶恶的嘴脸。

一切反动派都是主观唯心论者，他们不可能懂得压迫愈严重、反抗也愈大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以为用《辛丑条约》这副新的枷锁套在中国人民身上，就可以压制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了；清朝统治者以为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就可以得救了。然而《辛丑条约》刚签订，人民的揭帖就向他们预报了警钟，“扫清灭洋”的响亮口号，已在迎接新的战斗。《辛丑条约》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仇和阶级恨，使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再接再厉地起来革帝国主义的命，革清朝统治者的命，才是出路。

十一、义和团的反帝革命精神万岁

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深入中国大逞淫威的时候，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逃出北京的深宫，直奔远离战火的西安。他们把北京、天津及其附近的城市和乡村，交给帝国主义侵略军去掠夺、蹂躏。在这个紧急关头，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逃亡者，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性命，以及如何保住爱新觉罗王朝的皇冠。

以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为首的官僚、买办，无耻地欢呼帝国主义的胜利，高兴地看到义和团所受到的每一个打击。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卫士，替帝国主义守护着长江流域。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迷信帝国主义对中国会“性命死生相扶持”，甚至嫌八国联军太少，并要亲自帮助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

当时一般的官僚、绅士，当八国联军刚攻陷北京、义和团还在城门和街巷抵抗的时候，已经扯起了降旗，穿好了朝服，伏在大街两旁迎候八国联军的队伍。第二天早晨，很多朱漆的大门上都出现了用各种洋文写的保护单，还挂着洋人用过的帽、靴，表示对洋人的臣服。在帝国主义侵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时候，这些官僚、绅士竟毫无廉耻地给

联军送“万民伞”、“德政匾”，盗用群众的名义，歌颂联军的“功德”。

这些败类更把联军当做自己的救星，而把自己当作帝国主义的鹰犬。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不惜背叛祖国，替联军征发军需给养，为侵略军充当向导，捕捉团众。士大夫竟无耻地去参加瓦德西举行的考试，领取洋人的奖金。

整个清朝统治阶级，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官僚，包括洋务派、改良派、士大夫，这些平日大讲忠君爱国之道的人，一下子都滚进了帝国主义的怀抱。

“风雨喷长空，威雄惊万里”。只有坚贞不屈的义和团，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枪口，不是逃跑，而是迎头痛击；不是投降，而是抵抗；不是背叛自己的民族，而是至死不屈地英勇战斗。北京失守前夕，义和团还在东直门和朝阳门一带与联军肉搏。北京失陷后，帝国主义侵略军想从东交民巷使馆推进到西什库教堂，由于义和团英勇阻击，侵略军寸步难行，经过三天的巷战，付出四百多人伤亡的代价后，才到达目的地。有时外国侵略者走在胡同里，会突然遭到袭击。太平庄、海淀等地，都有侵略军的军官被杀死。连侵略军的驻地，也经常遭到石块、砖瓦的掷击。北京西山的八大寺和北京西南的良乡等处，都是义和团的重要据点。在天津，仍然不断出现义和团的反帝揭帖，连侵略军占领的东局子火药库，也被义和团炸毁。

京、津失陷时撤回农村和被打散的义和团，也重新集结起来，继续战斗。他们不断袭击京津、津榆交通线，还一度攻克怀柔县城，杀死了同侵略军勾结的密云县县官。

从京、津撤回冀中的义和团，在团众信服的农村教师祁子刚领导下，经过半年多整顿，重新活跃起来，占据雄县东乡的王家场。他们曾多次击败来犯的清军。有一次，雄县、新城、霸州、任邱四处的清军包围了王家场；大清河下游又开来了清军的炮船，不断向庄内开炮，情形十分危急。这时义和团分出一部分人，绕到清军的后方开枪袭击，清军溃乱。义和团乘胜进攻炮船，缴获了船上的全部军械物资，凯旋而归。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义和团认清了清朝政府的走狗面目。一九〇二年三月，广宗、巨鹿、威县的义和团和广大人民，在景廷宾领导下，高举“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他们捣毁了帝国主义的教堂，杀死了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景廷宾“扫清灭洋”的旗帜，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

景廷宾在广宗、巨鹿起义以后，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手忙脚乱、惊慌失措，急忙命令袁世凯派兵镇压。袁世凯为了博得中外主子的欢心，带着他的称作“督标”的总督亲兵，亲自到前线督战。德、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队六千多名，也从北京开往广宗、冀州一带，为清军助威。五月九日，清军分三路向起义军的根据地任村进攻。寨内的义和团严密防守，一个地方的寨墙被打开了缺口，其它地方义和团群众飞奔过来阻击清军，经过激烈的肉搏，清军才打进寨内。景廷宾又率领义和团转移到成安县的北漳堡，重新聚集力量，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份的群众，也展

开了反抗摊派赔款的斗争。帝国主义想通过条约、利用国内反动派来制止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给了它们有力的回击。

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身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在义和团运动以前，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吹嘘，只要有一万名现代化装备的侵略军，就能够横行全中国。他们并且一再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不再公开叫嚷瓜分中国了。这不是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改变了，不想瓜分中国了，而是因为，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狠狠地教训了它们，使它们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八国联军的总头目瓦德西，经过与中国人民较量后，也不能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的外交部次官布路德立克也无可奈何地说：“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议员也说：“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被瓜分，帝国主义之所以放弃瓜分中国的狠毒阴谋，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英勇斗争。

义和团运动也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加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帝国主义总是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捍卫者。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中国

各地的罪恶行动，扯掉了他们“文明”的假面具，赤裸裸地显现出帝国主义狰狞的本相。

义和团运动也彻底揭穿了清朝政府的卖国本质，削弱了封建统治势力，促进了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义和团的这些伟大历史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可是，长期以来，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却遭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恶毒诅咒和诽谤。当时，帝国主义咒骂义和团运动是“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攻击义和团，是“没有理性的行动”。五十年后，美帝国主义的头目艾奇逊，在臭名昭著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中，还诬蔑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

对于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当时就曾给予严厉的驳斥。他说：“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①

列宁的这些话，不仅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谣言和诡辩的有力驳斥，而且是对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的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四—三三五页。



2 037 8648 4

巨大鼓舞和支持。

刘少奇一类骗子长期以来也跟在帝国主义后面，咒骂义和团是“野蛮的”、“落后的”、“反动的”等等，他们把所有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都加到义和团的头上。但所有这些恶毒的咒骂，丝毫无损于坚持正义斗争的义和团的光辉形象，相反，只是更加暴露了他们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面目，表明了他们是仇视人民的民族败类，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革命斗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②“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③义和团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爱国热忱，他们赴汤蹈火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业绩，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将永远闪耀灿烂的光辉。

义和团的反帝革命精神万岁！

①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近代史丛书》 义和团运动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